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期末報告

「漢學」與近代日本政治思想的展開和越境——「同文」
想像與亞洲主義、國族主義的興起——

計畫類別：個別型
計畫編號：NSC 101-2410-H-009-023-
執行期間：101年08月01日至102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藍弘岳

計畫參與人員：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陳羿安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許惟豪
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郭珮君

報告附件：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出席國際會議研究心得報告及發表論文

公開資訊：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102年10月15日

中文摘要：本研究目的是以「同文」想像為基點，釐清近代日本的國族主義、亞洲主義思想與中國的亞洲主義、國族主義等政治思想之發展的關聯與對抗的複雜過程。基於上述之問題意識，分為三大部分。

- (1)「漢學」、「同文」想像與近代日本之亞洲主義的興起
- (2)「漢學」、「同文」想像與近代日本之國族主義的興起
- (3)「漢學」、「同文」想像與近代日本中之亞洲主義、國族主義的越境

但原本規劃為三年期計畫，但只通過一年期。在這一年中，筆者循國科會計畫的構想，舉辦了一個國際研討會（「第三屆台日亞洲未來論壇：近代日本政治思想的展開與東亞的民族主義」），並沿第三個問題意識，完成一篇論文〈明治知識〉的展開與殖民地臺灣的政治：「國民性」論述與1920年代前的「同化政策」。

此文將近代日本在建構民族國家乃至帝國主義國家過程中發明、發展出來的知識稱為〈明治知識〉，並將從此觀點來理解「國民性」論述的出現與殖民地臺灣政治狀況的一個面相。首先，本文探討「國民性」「國民精神」「民族性」「國民道德」等，〈明治知識〉中表述特殊日本精神性質的類義概念群如何在明治日本產生與運用的問題。然後，以1920年代前的「同化政策」為主，考察日本帝國官僚如何理解、操作「國民性」概念群進行統治。又，同時探析日治時期臺灣知識人如何理解、接受或抵抗「國民性」概念。主要檢討周維金(1882-?)及蔡培火(1889-1983)等《臺灣青年》相關知識人之論述與思想。透過上述人物的檢討，本文意圖揭露〈近代西方知識〉〈明治知識〉〈江戶知識〉〈中國漢學知識〉的類似、差異與其交錯所構成的1910到20年代間〈殖民地臺灣知識〉狀況的問題。

中文關鍵詞：漢學、國族主義、國民性、同化政策、殖民地臺灣

英文摘要：This project aims to introduce the knowledge of 'Kangaku' as one of the contexts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s of modern East Asia. First, I want to focus on how the 'Kangaku' and the imagination of 'doubun' developed in the Edo and the Meiji-period, arguing its relevance with Asiaism. Second, I want to discuss how 'Kokugaku' scholars criticized 'Kangaku', how they resisted the imagination of 'doubun', and how their thoughts carried more influ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nationalism. Third, I also want to survey how the Meiji intellectuals made use of the knowledge of 'Kangaku' to translate the concepts and texts of moder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s, especially on those of nation building.

Following the projects aims, I held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which tittle was 'Modern Japanese Political Thoughts and East Asia Nationalism', and wrote a paper this year. The tittle of this paper is 'The knowledge of Meiji and the Politics of Colonial Taiwan: the Discourses of 'National Character' and the Policy of Assimilation before 1920s'. In this paper, I discussed how the western concepts such as 'Geist' or 'National Character' were translated into Japanese concerning the knowledge background of 'Kangaku', and how the 'Kokuminsei(National Character, 國民性)' and the similar concepts were used in the Meiji-period. Then, I investigated the thoughts and terms concerning 'Kokuminsei' which were used in the policy of assimilation of colonial Taiwan before the 1920s. By doing so, I argued that the translated concepts of nationalism, spreading from Japan into Taiwan, are affected by the tradition of 'Kangaku' and the imagination of 'doubun', however the different social and languages contexts made the Japanese empire officials and colonial Taiwanese intellectuals misunderstood each other.

英文關鍵詞： 'Kangaku', Nationalism, 'Kokuminsei', policy of assimilation, Colonial Taiwan

「漢學」與近代日本政治思想的展開和越境

——「同文」想像與亞洲主義、國族主義的興起——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101-2410-H-009-023-

執行期間：101年8月1日至102年7月31日

執行機構及系所：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藍弘岳

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陳羿安、許惟豪、郭珮君

本計畫除繳交成果報告外，另含下列出國報告，共 __2__ 份：

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

處理方式：除列管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一年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10 月 8 日

目錄

中文摘要	II
英文摘要	III
一 報告內容	1
1 前言	
2 研究目的	
3 文獻探討	
4 研究方法	
5 結果與討論	
二 參考文獻	5
三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9
四 附錄論文	11
五 附表	43

中文摘要

本研究目的是以「同文」想像為基點，釐清近代日本的國族主義、亞洲主義思想與中國的亞洲主義、國族主義等政治思想之發展的關聯與對抗的複雜過程。基於上述之問題意識，分為三大部分。

- (1) 「漢學」、「同文」想像與近代日本之亞洲主義的興起
- (2) 「漢學」、「同文」想像與近代日本之國族主義的興起
- (3) 「漢學」、「同文」想像與近代日本中之亞洲主義、國族主義的越境

但原本規劃為三年期計畫，但只通過一年期。在這一年中，筆者循國科會計畫的構想，舉辦了一個國際研討會（「第三屆台日亞洲未來論壇：近代日本政治思想的展開與東亞的民族主義」），並沿第三個問題意識，完成一篇論文〈明治知識〉的展開與殖民地臺灣的政治：「國民性」論述與1920年代前的「同化政策」。

本文將近代日本在建構民族國家乃至帝國主義國家過程中發明、發展出來的知識稱為〈明治知識〉，並將從此觀點來理解「國民性」論述的出現與殖民地臺灣政治狀況的一個面相。首先，本文探討「國民性」「國民精神」「民族性」「國民道德」等，〈明治知識〉中表述特殊日本精神性質的類義概念群如何在明治日本產生與運用的問題。然後，以1920年代前的「同化政策」為主，考察日本帝國官僚如何理解、操作「國民性」概念群進行統治。又，同時探析日治時期臺灣知識人如何理解、接受或抵抗「國民性」概念。主要檢討周維金(1882-?)及蔡培火(1889-1983)等《臺灣青年》相關知識人之論述與思想。透過上述人物的檢討，本文意圖揭露〈近代西方知識〉〈明治知識〉〈江戶知識〉〈中國漢學知識〉的類似、差異與其交錯所構成的1910到20年代間〈殖民地臺灣知識〉狀況的問題。

關鍵字：漢學、國族主義、國民性、同化政策、殖民地臺灣

Abstract

This project aims to introduce the knowledge of “Kangaku” as one of the contexts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s of modern East Asia. First, I want to focus on how the “Kangaku” and the imagination of “doubun” developed in the Edo and the Meiji-period, arguing its relevance with Asiaism. Second, I want to discuss how “Kokugaku” scholars criticized “Kangaku”, how they resisted the imagination of “doubun”, and how their thoughts carried more influ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nationalism. Third, I also want to survey how the Meiji intellectuals made use of the knowledge of “Kangaku” to translate the concepts and texts of moder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s, especially on those of nation building.

Following the projects aims, I held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which title was ‘Modern Japanese Political Thoughts and East Asia Nationalism’, and wrote a paper this year. The title of this paper is ‘The knowledge of Meiji and the Politics of Colonial Taiwan: the Discourses of “National Character” and the Policy of Assimilation before 1920s’. In this paper, I discussed how the western concepts such as “Geist” or “National Character” were translated into Japanese concerning the knowledge background of “Kangaku”, and how the “Kokuminsei(National Character, 國民性)”and the similar concepts were used in the Meiji-period. Then, I investigated the thoughts and terms concerning “Kokuminsei” which were used in the policy of assimilation of colonial Taiwan before the 1920s. By doing so, I argued that the translated concepts of nationalism, spreading from Japan into Taiwan, are affected by the tradition of “Kangaku” and the imagination of “doubun”, however the different social and languages contexts made the Japanese empire officials and colonial Taiwanese intellectuals misunderstood each other.

Key words: “Kangaku”, Nationalism, “Kokuminsei”, policy of assimilation, Colonial Taiwan

一 報告內容

1 前言

本計畫題名為〈「漢學」與近代日本政治思想的展開和越境——「同文」想像與亞洲主義、國族主義的興起——〉。原本規劃為三年期計畫，但只通過一年期。在這一年中，筆者循國科會計畫的構想，舉辦了一個國際研討會（「第三屆台日亞洲未來論壇：近代日本政治思想的展開與東亞的民族主義」），在有限期間內，筆者自身撰述一篇3萬字以上的論文，並在會中發表。以下以該文（後述）為主進行報告。

2 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是以「同文」想像為基點，釐清近代日本的國族主義、亞洲主義思想與中國的亞洲主義、國族主義等政治思想之發展的關聯與對抗的複雜過程。基於上述之問題意識，分為三大部分。

(1) 「漢學」、「同文」想像與近代日本之亞洲主義的興起

即深入江戶漢學中，探究「文」（「文學」）與「東洋傳統」等觀念之結合，從而導致「同文」想像形成的過程，及其與明治時期之亞洲主義思想的關聯。

(2) 「漢學」、「同文」想像與近代日本之國族主義的興起

釐清「漢學」、「同文」想像與近代日本國族主義之關聯，進而闡明近代日本的亞洲主義與國族主義乃至「天」「理」等普遍主義思想間存在的共生又對抗之關係與結構。

(3) 「漢學」、「同文」想像與近代日本中之亞洲主義、國族主義的越境

考察與日本國族主義相關的思想概念、文本、理論與運動是如何互相交錯，促進近代中國國族主義的發展。

總而言之，本研究企圖結合「漢學」與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特別是從日本政治思想史的角度而言，從丸山真男以後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一直主要是從國族主義的發展、挫折到帝國主義的成長等方式來論述近代日本政治思想的。相對之，本研究則欲更深入江戶思想中之「漢學」傳統內部，以「同文」想像為媒介，從國族主義與亞洲主義（帝國主義）之並行發展與複雜的對抗又共生的關係來論述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再者，本研究基本上認為共具「漢學」傳統的東亞各國在接受西方近現代思想之時，其歷史過程錯綜複雜而緊密相聯，日本與中國的近現代思想並非各自在其國家疆界內，獨自受西洋衝擊之結果，除與固有社會與文化的發展相關外，更與漢文的媒介相關。正是在此意義上，吾人當將日本的「漢學」導入近代東亞政治思想史的分析中，探究在東亞漢文圈中以漢文為媒介所引發的思想連鎖，及在兩個知識圈內部出現的亞洲主義與國族主義思想的發展，及兩者間之緊張關係。希望透過對上述之問題的研究，能重構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外，亦能進一步釐清近現代東亞思想史的問題，以促進該領域的成立與發展，並提供一些思考當代東亞問題的線索。

3 文獻探討

實際在進行時，在上述 2 與 3 的問題意識的引導下，舉辦了一個國際研討會（「第三屆台日亞洲未來論壇：近代日本政治思想的展開與東亞的民族主義」），並在會中，自己發表〈〈明治知識〉的展開與殖民地臺灣的政治——「國民性」論述與 1920 年代前「同化政策」、國族認同——〉一文，後修為〈〈明治知識〉的展開與殖民地臺灣的政治——「國民性」論述與日治時代 1920 年代前的「同化政策」〉一文將發表在專書《帝國在台灣》第二冊。

在該文中，筆者閱讀大量的明治時代的國民性相關書籍（如坂井衡平《日本國民性論》1922，請參見附錄論文的附表一），及《樗牛全集 第 2 卷》、井上哲次郎《國民道德概論》等，探討「國民性」「國民精神」「民族性」「國民道德」等，〈明治知識〉中表述特殊日本精神性質的類義概念群如何在明治日本產生與運用的問題。然後，閱讀《伊澤修二選集》《日本殖民地教育政策史料集成（臺灣篇）》、《後藤新平文書》、鶴見裕輔寫的《正傳 後藤新平》等資料與研究，以 1920 年代前的「同化政策」為主，考察日本帝國官僚如何理解、操作「國民性」概念群進行統治。又，以《臺灣日日新報》等的資料庫與《蔡培火全集》等資料探析日治時期臺灣知識人如何理解、接受或抵抗「國民性」概念。主要將檢討周維金(1882-?)及蔡培火(1889-1983)等《臺灣青年》相關知識人之論述與思想。

4 研究方法

本研究從概念史與翻譯論的問題視角出發看問題，將文學思想史導入政治思想史的分析中，重視社會文化差異與「同文」表象背後語文修辭脈絡差異的脈絡主義方法論，探究與民族主義相關的「國民性」概念在明治日本如何被翻譯、發展，及該概念如何在台灣殖民地時期的漢文與日語文獻中被理解、運用與抵抗等相關的政治思想史問題。

5 結果與討論

首先，筆者於 2013 年 1 月 22 日至 2013 年 2 月 1 日到日本東京進行移地研究，到日本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等地搜集齋藤智明《井上毅：明治國家形成と世俗主義》、《芳賀矢一選集》、佐野學編的《日本國民性の研究》（大鐙閣，1921）等資料，並到書店購買相關書籍。例如：購買尹健次《民族幻想の蹉跎：日本人の自己像》等書。

再者，筆者在計畫期間舉辦了一個國際研討會（「第三屆台日亞洲未來論壇：近代日本政治思想的展開與東亞的民族主義」），並在會中，自己發表〈〈明治知識〉的展開與殖民地臺灣的政治——「國民性」論述與 1920 年代前「同化政策」、國族認同——〉（A 論文）。又到日本參加 2013 年日韓政治思想學會共同學術會議，並發表〈〈明治の知識〉における「国民性」言説の展開と儒教——井上哲次郎から 1920 年代の台湾知識人・蔡培火まで——〉（B 論文）一文。在與會過

程中，筆者發表的論文由東京大學法學部苅部直教授評論。苅部教授可說是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領域的權威學者。苅部教授除正面肯定筆者的論文外，亦提出一些疑問，主要是指出筆者的蔡培火論的國民性批判的問題。並在會後提供一些相關的論文與研究資料的情報。對筆者來說可謂收穫良多。此外，在會議過程中，筆者與韓國的政治思想研究者亦有所交流，討論包括台灣在內的政治思想研究狀況等，對筆者而言，相當新鮮，亦多所啟發。另外，會中有韓國學者報告韓國的多元文化主義狀況的問題，對筆者而言是未知的知識領域，深獲啟發。

另外，參與 Asia Future Conference 2013，發表〈「共和」概念と十九世紀日本政治思想——東アジアにおける近代政治概念の翻訳と政治言説の展開——〉(C 論文)。該論文是前次研究計畫中撰寫之中文論文再修正為日文版的。其問題意識與本計畫相關，故計為成果之一。再者，筆者修正、增補先前發表的論文為“Facing the Sea, Becoming the West: The Imagination of Maritime Nation and Discourses of Asia in Japan” (D 論文)，將收於 *European-East Asian Borders in Translation* (預定 2013 年出版)。該論文是前次研究計畫中撰寫之英文論文再修正，再增補上中國之「海國」想像問題及其與日本的關係部分，其問題意識與本計畫亦相關，故計為成果之一。

如上，B 論文是一部分 A 論文的日語版，C 與 D 論文則之前的國科會論文的日語版與英文版，故主要成果可謂是 A 論文。A 論文又將以〈〈明治知識〉的展開與殖民地臺灣的政治—「國民性」論述與 1920 年代前的「同化政策」〉(E 論文) 為題，已投稿於《帝國在台灣》第二冊。基本上，A 與 B 與 E 皆是同一系列的論文，但 A 論文皆結論導向 1920 年代台灣國族認同問題，B 論文則導向多元文化主義的問題。E 論文則在 A 與 B 論文基礎上修正而成的，故以下以 E 論文為主簡述其內容。

首先，E 論文將近代日本在建構民族國家乃至帝國主義國家過程中發明、發展出來的知識稱為〈明治知識〉，並將從此觀點來理解「國民性」論述的出現與殖民地臺灣政治狀況的一個面相。筆者認為要理解臺灣殖民地時期的政治狀況與思想，有必要深入〈明治知識〉中，尋其脈絡思考。故在 E 論文中，筆者探討「國民性」「國民精神」「民族性」「國民道德」等〈明治知識〉中表述特殊日本精神性質的類義概念群如何在明治日本產生與運用的問題。然後，以 1920 年代前的「同化政策」為主，考察日本帝國官僚如何理解、操作「國民性」概念群進行統治。再者，探析 1920 年代日治時期臺灣知識人如何理解、接受或抵抗「國民性」概念的問題。主要檢討周維金(1882-?)及蔡培火(1889-1983)等《臺灣青年》相關知識人之論述與思想。透過上述人物的檢討，本文意圖揭露〈近代西方知識〉〈明治知識〉〈江戶知識〉〈中國漢學知識〉的類似、差異與其交錯所構成的 1910 到 20 年代間〈殖民地臺灣知識〉狀況的問題。

C 論文則是之前發表的〈「共和」概念與十九世紀日本與中國之政治思想——從概念的翻譯到相關政治論述的展開、轉折——〉的日文簡略版。主要就漢文脈與和文脈等不同文脈間翻譯的角度，從日本政治思想史的發展，特別是就幕

末樹立雄藩聯合政權的行動與論述，及明治時期的自由民權相關政治論述，乃至亞洲主義相關論述等，釐清「共和」與其相關概念在日本翻譯、接受與展開、轉折，並越境到中國的過程。

D論文是已刊登在《文化研究》14期(2012)的〈面向海洋，成為西洋——「海國」想像與日本的亞洲論述——〉一文的英文版，但內容有再增補。主要從「陸權國家」與「海權國家」鬥爭的世界史構想出發，從18、19世紀日本知識人話語中，去看日本如何從一個「島國」變成向外開放的商業文明的「海國」乃至「海權國家」，及最後欲成為「陸權國家」而終至失敗的過程。又，在此基礎上，筆者進一步探究日本的「海國」想像與其在近代亞洲的擴張之關聯。然後亦分析現代中國的「海國」想像、欲望與今後的東亞在海洋對抗的問題。

總結而言，在這一年的計畫中，筆者花約大部分的時間撰述新論文外，亦花約一部分時間把過去計畫的論文翻譯為外文並增補與計畫相關內容發表。

二 參考文獻

1 中日文參考文獻

-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52。
- 山路愛山，《現代日本教會史論》，收入《日本の名著40》，東京：中央公論社，1971。
- 山内育男，〈「愛國」という語〉，《参考書誌研究》第31號，1983。
- 山室信一，《思想課題としてのアジア：基軸・連鎖・投企》，東京：岩波書店，2001。
- 大田英昭，《日本社會民主主義の形成：片山潜とその時代》，東京：日本評論社，2013。
- 小熊英二，《單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畫像の系譜》，東京：新曜社，1995。
- 小熊英二，《〈日本人〉の境界：沖繩・アイヌ・臺灣・朝鮮殖民地支配から復興運動まで》，東京：新曜社，1998。
- 上沼八郎，《伊澤修二》，東京：吉川弘文館，1988。
- 井上哲次郎，《日本陽明學派の哲學》，東京：富山房，1900。
- 井上哲次郎，《日本古學派の哲學》，東京：富山房，1902。
- 井上哲次郎，《日本朱子學派之哲學》，東京：富山房，1905。
- 井上哲次郎，《勅語衍義》，收入《井上哲次郎集 第1卷》，東京：クレス出版，2003。
- 井上哲次郎，《增訂勅語衍義 卷下》，東京：文盛堂，1899。
- 井上哲次郎，《國民道德概論》，收入《井上哲次郎集 第2卷》，東京：株式會社クレス出版，2003。
- 尹健次，《民族幻想の蹉跎：日本人の自己像》，東京：岩波書店，1994。
- 内藤燦聚編，《軍人讀本：忠君愛國》，東京：博文館，1892。
- 内田良平，《支那觀》，東京：黑竜會，1913。
- 中島力造，《戰後の變動と國民性教育》，東京：目黒書店 1916。
- 中越榮二，《臺灣の社會教育》，臺北：臺灣の社會教育刊行所，1936。
- 矢内原忠雄，〈軍事的と同化的・日仏殖民政策比較の一論〉，收入《矢内原忠雄全集 第四卷》，東京：岩波書店，1963。
- 田健治郎傳記編纂會，《田健治郎傳》，東京：田健治郎傳記編纂會，1932。
- 若林正丈，《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 增補版》，東京：研文出版社，2001。
- 石井寛治，〈問題提起（日本資本主義と植民地）〉，《社會經濟史學》51(6)，1986
- 石田雄，《明治政治思想史研究》，東京：未來社，1954。
- 石田雄，《記憶と忘却の政治學：同化政策・戦争責任・集合的記憶》，東京：明石書店，2000。
- 平石直昭〈主体・天理・天帝--横井小楠の政治思想-1-〉，《社会科学研究》25(5)，

1974。

有馬祐政，《日本國道論 = Our nationality》，東京：富山房，1907。

永井亨，《國民性及時代思想》，東京：岩波書店，1926。

吉田精一，《近代文藝評論史 明治篇》，東京：至文堂，1981。

伊澤修二，《伊澤修二選集》，長野：信濃教育會，1958。

伊澤修二，《樂石自傳 教界周遊前記》，東京：伊澤修二君還曆祝賀會，1912。

安西敏三，《福澤諭吉と自由主義：個人・自治・國體》，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07。

江島顯一，〈明治期における井上哲次郎の「國民道德論」の形成過程に関する一考察—『勅語衍義』を中心として〉，《慶應義塾大學大學院社會學研究科紀要》67，2009。

坂井衡平，《日本國民性論》，東京：大日本圖書，1922。

坂野徹，〈人種・民族・日本人：戰前日本の人類學と人種概念〉，《人種概念の普遍性を問う—西洋的パラダイムを超えて》，竹澤泰子編，京都：人文書院，2005。

長谷川如是閑，〈批判的見地より觀たる我國民性〉，《解放4月特大號 日本國民性の研究》，佐野學編，東京：大鐙閣，1921。

長志珠繪，《近代日本と國語ナショナリズム》，東京：吉川弘文館，1998。

松田宏一郎，《江戸の知識から明治の政治へ》，東京：ぺりかん社，2008。

松田宏一郎，《陸羯南》，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08。

苅部直，〈帝國の倫理：後藤における理想主義〉，《時代の先覺者 後藤新平》，東京：藤原書店，2004。

花森重行，〈國文學研究史についての一考察：1890年代の芳賀矢一をめぐって〉，《日本學報》21，2002。

芳賀矢一，《國民性十論》，東京：富山房，1907。

後藤新平，〈後藤長官の訓示〉，《臺灣教育會雜誌》27，1904。

後藤新平，《後藤新平論集》，東京：伊藤元治郎，1911。

後藤新平，〈最近植民政策〉，《同志社時報》115号，1914。

後藤新平，《日本植民論》，東京：公民同盟出版部，1915。

後藤新平，〈臺灣統治急務策の意見書〉，收於《後藤新平文書》。

春山明哲，《近代日本と臺灣：霧社事件・殖民地統治政策の研究》東京：藤原書店，2008。

品田悦一，〈排除と包攝——國學・國文學・芳賀矢一〉，《國語と國文學》，2012。

前田愛，《幻景の明治 前田愛著作集第四卷》，東京：筑摩書房，1989。

高山樗牛，《樗牛全集 第2卷》，東京：博文館，1912。

柴田廉，《臺灣同化策論》，臺北：成文出版社，1999。

宮崎滔天，《支那革命物語》，收入《宮崎滔天全集 第1卷》，東京：平凡社，1971。

- 黒住真，《近世日本社会と儒教》，東京：ぺりかん社，2003。
- 陳培豐，《「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本帝國的臺灣國語政策・近代化・認同》，臺北：麥田，2006。
- 陳翠蓮，〈臺灣政治史研究的新趨勢——從抵抗權力到解構權力〉，《漢學研究通訊》28：4，2009。
- 野田義夫，《日本國民性の研究》，東京：教育新潮研究會，1914。
- 隈本繁吉，〈本島人の同化に就いて〉，《臺灣教育》154，1952。
- 荻生徂徠，《弁名》，收入《荻生徂徠 日本思想大系 36》，東京：岩波書店，1973。
- 鹿野政直，〈臣民・市民・國民〉，《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 I》，東京：有斐閣，1970。
- 渡邊浩，《近世日本社会と宋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5。
- 渡邊浩，〈「教」と陰謀——「國體」の一起源〉，《韓國・日本・「西洋」——その交錯と思想變容》，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05。
- 鈴木貞美編，《雜誌『太陽』と國民文化の形成》，鈴木貞美編，京都：思文閣，2001。
- 鈴木貞美，《日本の文化ナショナリズム》，東京：平凡社新書，2005。
- 福澤諭吉，《文明論の概略》，收入《福澤諭吉全集 第四卷》，東京：岩波書店，1959。
- 駒込武，《殖民地帝國日本の文化統合》，東京：岩波書店，1996。
- 網島梁川，《梁川文集》，東京：日高有倫堂，1905。
- 蔡培火，《蔡培火全集》，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0。
- 蔡錦堂，〈日本治臺時期所謂「同化政策」的實像與虛像初探〉，《淡江史學》13，2002。
- 溝部英章，〈後藤新平論——鬭争の世界像と“理性の独裁”——〉，《法學論叢》101 卷第 2 號。
- 緒方武藏編，《臺灣大年表》，臺北：臺北印刷株式會社，1938。
-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 上》，收入《日本殖民地教育政策史料集成(臺灣篇) 28》，東京：龍溪書舍，2008。
- 臺灣教育會，〈臺灣公學校規則改正せらる〉，《臺灣教育》128，1912。
- 劉家均，〈國民性の涵養と臺灣教育〉，《教育論文集》，1922。
- 鶴見祐輔，《決定版 正傳後藤新平 第三卷》，東京：藤原書店，2005。

2 英文參考文獻

- Lydia H.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Roberto Romani, *National Character and Public Spirit in Britain and France, 1750-1914*. Cambridge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C.S. Baron de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Laws*. translated by Anne M. Cohler, Basia

Carolyn Miller, Harold Samuel Stone, Cambridge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三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 達成目標
-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 實驗失敗
- 因故實驗中斷
- 其他原因

說明：

就以通過的一年期計畫而言，本人之計畫可謂已達成目標。只是因一些外部因素與閱讀資料的影響轉向探討日本民族主義與殖民地台灣之政治思想的關係，但依然是在研究原本預定的近代日本之亞洲主義、國族主義相關概念的越境問題。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PS 上述已發表指在研討會發表過，並已收於專書或已投稿之意。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在計畫期間，筆者完成、發表如下的論文。

1 〈「共和」概念と十九世紀日本政治思想——東アジアにおける近代政治概念の翻訳と政治言説の展開——〉。

2 “Facing the Sea, Becoming the West: The Imagination of Maritime Nation and Discourses of Asia in Japan”

3 〈〈明治知識〉の展開與殖民地臺灣的政治—「國民性」論述與 1920 年代前的「同化政策」〉

第一篇日文論文從漢文脈與和文脈等不同文脈間翻譯的角度來論述的方法具獨創性，將使本研究成果在日文學界亦具學術應用之價值。

第二篇論文是少數在英文相關研究中從「海國」想像的觀點論述日本的亞洲主義，又同時探討 Afred Thayer Mahan 的海權思想在近代日本與當代中國展開之論文。本文對於今後東亞海權問題的探討當具參考價值。

在第三篇論文筆者提出新的〈明治知識〉概念來探討殖民地台灣時期的知識情況問題。這可謂是一新的視角，具創新性。再者，本文亦論述、整理「國民性」概念在近代日本與台灣殖民地時期的使用情況（見附錄論文的附表），具參考與應用之價值。又，因筆者在文中亦只分析 1920 年代前的情況，故具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最後，本文揭露的〈近代西方知識〉〈明治知識〉〈江戶知識〉〈中國漢學知識〉的類似、差異與其交錯所構成的 1910 到 20 年代間〈殖民地臺灣知識〉狀況當對該領域之研究有一定的刺激與貢獻。

〈明治知識〉的展開與殖民地臺灣的政治

—「國民性」論述與 1920 年代前的「同化政策」—¹

前言

「國民性」的語義曖昧。這大抵是一般具某種程度學術性的國民性論中會先聲明的一點²。儘管如此，為何這一曖昧概念在二十世紀初期被大量使用來解釋日本的成功與中國的失敗，進而運用於殖民地的「同化政策」中（後述）？究竟何為「國民性」？這只是個翻譯自西方的概念³？還是有其漢文圈內部的知識脈絡可尋？

在一連串疑問的引導下，本文將近代日本在建構民族國家乃至帝國主義國家過程中發明、發展出來的知識稱為〈明治知識〉，並將從此觀點來理解「國民性」論述的出現與殖民地臺灣政治狀況的一個面相。因為若從東亞漢文圈的知識史、思想史角度理解明治時代，那可說是一個東亞漢文圈中現代性知識基礎形成的時代⁴。然而，明治知識人對於近代西洋知識的大量翻譯、吸收與其政治思想發展，強烈依賴於江戶時代的漢學、國學、蘭學等〈江戶知識〉外，更受到江戶時代社會與文化的制約⁵。因之，〈明治知識〉中有一種在〈江戶知識〉的基礎上，透過漢文與日語的翻譯，向近代西方文明學來的想像「民族」、打造「國家」的知識體系。亦有一種在江戶社會與文化的基礎上，訴諸日本獨特歷史與神話，歌頌天皇統治萬世一系的政治與文化論述。這兩種知識交錯，構成一套近代日本打造國族的知識基礎。

綜上所述，本文中所謂的〈明治知識〉主要是，一套承繼江戶知識傳統與其社會文化，又透過漢文與日語之翻譯以模倣西方文明的近代國家知識體系。又因〈明治知識〉承載東亞國家共有的漢學傳統，故對於漢文圈國家或殖民地的知識

¹ 本論文為國科會計畫 NSC101-2410-H-009-023-的成果之一。

² 長谷川如是閑，〈批判的見地より觀たる我國民性〉（《解放4月特大號 日本國民性の研究》，佐野學編，東京：大鐙閣，1921），頁5，及永井亨，《國民性及時代思想》（東京：岩波書店，1926），頁1、2等。

³ 說到翻譯，近年來 Lydia H.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相當受到注目。該書強調在近代歐洲知識譯介到中國的過程中，做為接受一方的「主方語言」(host language、本土語言)之主體性與能動性，及翻譯語之意義生成的偶然性，從而得以批判西方中心的現代性論。該書亦選擇在第二章中討論「國民性」一語，主要將之視為 national character 的譯語而展開新鮮的近代中國文學論。然而，吾人不得不說雖其後殖民主義式翻譯理論有其意義與貢獻，但未能對「國民性」在漢文脈中之生成過程有進一步思考。

⁴ 山室信一，《思想課題としてのアジア：基軸・連鎖・投企》（東京：岩波書店，2001）大概是從此觀點出發所做的最完整代表性研究。

⁵ 關於此問題，參閱松田宏一郎，《江戸の知識から明治の政治へ》（東京：ぺりかん社，2008）。又，本文所謂〈明治知識〉亦參考該書名。

人而言，是較容易複製的知識。亦因之，其得成為東亞國家和殖民地獲得現代性知識的主要媒介之一。

所以，本文認為要理解臺灣殖民地時期的政治狀況與思想，有必要深入〈明治知識〉中，尋其脈絡思考⁶。首先，本文擬探討「國民性」「國民精神」「民族性」「國民道德」等，〈明治知識〉中表述特殊日本精神性質的類義概念群如何在明治日本產生與運用的問題。然後，以1920年代前的「同化政策」⁷為主，考察日本帝國官僚如何理解、操作「國民性」概念群進行統治。又，同時探析日治時期臺灣知識人如何理解、接受或抵抗「國民性」概念。主要將檢討周維金(1882-?)及蔡培火(1889-1983)等《臺灣青年》相關知識人之論述與思想。透過上述人物的檢討，本文意圖揭露〈近代西方知識〉〈明治知識〉〈江戶知識〉〈中國漢學知識〉的類似、差異與其交錯所構成的1910到20年代間〈殖民地臺灣知識〉狀況的問題。

一 〈明治知識〉中的「國民性」概念群之誕生

1 洋文脈中的「國民性」與翻譯

在現代中文中，「國民性」一般被理解為 national character 的譯詞。但在明治時代，「國民性」的對應譯詞有許多個。首先，引導「國民性」一詞流行的芳賀矢一所使用的「國民性」可能是在欲翻譯德語 Geist 的情況下開始使用的，不過在明確使用「國民性」一詞前，他也嘗試使用過「日本人特有的思想、感情、道德」「日本國民心性」「國民之性質」「國民之特性」等語句⁸。又如井上哲次郎則將「國民の性格」(「民族の性格」)做為德語 volkscharacter 的譯詞使用⁹。又如坂井衡平在《日本國民性論》(1922)認為日語中之「國民性」可能對應於

⁶ 關於日治時期的臺灣政治史研究，如陳翠蓮所指出的，「日治時期有關日本統治當局殖民政策與臺灣人的武裝抗日、反殖民運動研究，是最受到青睞的主題，也累積了最多研究成果」(〈臺灣政治史研究的新趨勢——從抵抗權力到解構權力〉，《漢學研究通訊》28:4, 2009, 頁2)。同時，陳氏亦指出近代臺灣政治史的研究已從「抵抗權力」走「解構權力」、即分析權力的知識建構等相關研究。就此分類而言，本文亦屬後者，然不訴諸於後殖民理論，而是企圖在〈明治知識〉這一分析概念的媒介下，考察殖民者的知識建構與被殖民者如何在交錯的知識傳統中，進入殖民者的知識話語中對話、抵抗、展開自己的思想。

⁷ 關於「同化」的研究，不勝枚舉。如石田雄在《記憶と忘却の政治學：同化政策・戦争責任・集合的記憶》(東京：明石書店，2000)中將「同化政策」理解為「日本人化」政策，指出該政策具「包攝」與「排除」兩個面相(頁53)，另一方面，石田亦把「同化政策」理解為以「文明」(特別指物質文明、「富國強兵」)之名正當化日本的擴張之政策(頁110、111)。駒込武在《殖民地帝國日本の文化統合》(東京：岩波書店，1996)，從「國民統合」與「文化統合」兩個層次來討論「同化政策」問題。陳培豐在《「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本帝國的臺灣國語政策・近代化・認同》，臺北：麥田，2006)則是主要從國語教育觀點來討論「同化」問題之作，以「文明的同化」「民族的同化」兩個分析概念展開論述。蔡錦堂在〈日本治臺時期所謂「同化政策」的實像與虛像初探〉(《淡江史學》13, 2002)中，敦促吾人注意所謂「同化政策」在整個殖民時期的意義轉變與其意義之複雜性、多元性。在這些先行研究中，「國民性」問題或多或少皆有被注意到，但似未有全面從「國民性」觀點來檢討「同化政策」問題者。又如後述，相對於這些先行研究，本文擬分四個層次來探討「同化政策」問題。

⁸ 品田悅一，〈排除と包攝——國學・國文學・芳賀矢一〉(《國語と國文學》，2012)，頁7。

⁹ 井上哲次郎，《國民道德概論》(《井上哲次郎集 第2卷》東京：株式會社クレス出版，2003)，頁297。

nationality、national character、national spirit 等英語概念¹⁰。但實際上有些明治知識人當是透過德語與英語以外的法語去接觸到「國民性」相關概念的。如後述的《論法的精神》(*L'Esprit des lois /The Spirit of the Laws*)就是論述「國民性」的重要法語作品。更麻煩的是，從另一角度來看，如 nationality 的對應譯詞又非「國民性」而已，亦有被譯為「國體」¹¹「國粹」¹²甚至「國道」¹³的。總之，就翻譯的角度來說，「國民性」隨使用之人與時的不同，可能對應於不同的歐美語言與語詞。

不管如何，在洋文脈中，有關「國民性」相關論述大約在希臘時代就存在，但在 18 世紀開始討論「國民性」與氣候、政體間的關係¹⁴。其中的代表作是《論法的精神》(*L'Esprit des lois /The Spirit of the Laws*)。在該書中用來指涉「國民性」的有「Caractère d'une nation/national character」、「esprit général d'une nation /the general spirit of the nation」等語詞。C. S. Baron de Montesquieu(1689-1755)在該書的 14 篇到 19 篇的部分，從氣候、地理決定論的角度，談氣候等自然要素為國民性生成的科學根據¹⁵。後來，在 19 世紀的歐洲，隨代議制度的興起，「國民性」論述更與西歐市民社會中有關市民政治資質的討論密接相關，被解釋為成就代議制度的原因之一¹⁶。也就是，西歐國家的「國民性」儘管有差異，但被理解為一種文明的心性。所以，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被用來說明西方人的優越。這是二十世紀初期，日本的「國民性」論流行的重要背景。

但吾人若要理解日本的「國民性」概念形成過程，除翻譯外，亦當從〈明治知識〉的脈絡，特別是漢文脈來考察。就漢文脈來說，「國民性」是在近代意義的「國民」概念出現之後，由「國民」結合「性」一概念而成的，故先簡單探究「國民」概念在近代日本創出的過程。

2 「國民」「民族」在近代日本的創出

在近代西洋政治思想史上，nation 至少有政治共同體與文化共同體兩種意涵，而漢文脈意義的「國民」「民族」皆是透過對 nation 不同意涵的翻譯而被發

¹⁰ 坂井衡平，《日本國民性論》(東京：大日本圖書，1922)，頁 4。如 Israel Zangwill, *The Principle of nationalities*(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7)被譯為《國民性原論》(坂井衡平，《日本國民性論》，頁 24)。

¹¹ 福澤諭吉在《文明論の概略》中，將「國體」做為「ナショナルリチ」(nationality)的譯語使用，定義為「一種の人民、共に世態の沿革を経て懷古の情を同ふする者」(《福澤諭吉全集 第四卷》(東京：岩波書店，1959，頁 27)。

¹² 如陸羯南受德國國家學影響，將 nationality (ナショナルリチ)譯為「國粹」外，又譯為「國民主義」，將之理解為一種國民的特性(松田宏一郎，《陸羯南》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08，頁 95-100)。

¹³ 有馬祐政，《日本國道論 = Our nationality》(東京：富山房，1907)。

¹⁴ Roberto Romani, *National Character and Public Spirit in Britain and France, 1750-1914*(Cambridge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11.

¹⁵ 參閱 C.S. Baron de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Laws*(translated by Anne M. Cohler, Basia Carolyn Miller, Harold Samuel Stone, Cambridge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¹⁶ Roberto Romani, *National Character and Public Spirit in Britain and France, 1750-1914*, p1-11.

明的¹⁷。與近代西歐國家不同，明治國家是在薩摩、長州等西南雄藩主導的情況下，以「王政復古」方式成立的，而非內部市民階級之形成、成熟所導致的結果。不過，近代日本也是先統合為一個政治共同體，而後再展開文化國族主義論述的¹⁸。首先，如在《文明論の概略》（初版1875年）中曰：「日本には政府ありて國民（ネーション）なし（日本有政府但無國民）」¹⁹。福澤明確說明其所用的「國民」為「ネーション(nation)」之意，而主張政治共同體意義的「國民」²⁰依然是等待被創出的狀態。基本上，雖有個人差異，明治啓蒙知識人及自由民權運動知識人大都為創出「國家」(state)與政治共同體意義的「國民」而努力。

但在打造「國家」、製造「國民」過程中，亦會出現文化認同危機，故在雜誌《日本人》及報紙《日本》等國粹主義者的言論出現大量使用「國民」一詞的文化國族主義論述，主要從文化共同體意義來理解「國民」。雖該種論述未能突破君主制的框架，訴諸於特殊日本社會與歷史文化事物及國民情感等，但試圖區別「國民」與「臣民」²¹。不過，在《軍人勅諭》（1882）乃至《教育勅語》（1890）的發布之後，明治政府所發明的「臣民」理念普及，言明教育的目標是「忠君愛國」²²，從而使「國民」概念亦漸受「臣民」理念之制約。

另一方面，同樣以雜誌《日本人》報紙《日本》在1888年的創刊為始，「民族」這一語彙亦開始出現於日語中，特別是志賀重昂在《日本人》開始使用「大和民族」，主要理解為歷史與文化的共同體，但在《日本人》中「大和民族」與「日本國民」大抵是混用的²³。即在十九世紀末期以後，在漢文脈中，「民族」既具文化共同體意義的 nation 之意，亦具 ethnic group 之意，而在文化共同體意義上，「民族」與「國民」則常被混用。但相較於「民族」，「國民」較早被使用且具較強的政治共同體之意。

無論如何，明治前期日本知識人雖先致力於政治共同體意義的「國民」建構，但後來主要是在文化共同體意義上展開單一民族國家想像的。如在1892年穗積八束在寫有關國體論文章〈家制及國體〉時從「國體」與文化、血緣的觀點，展開日本是單一民族的國家想像²⁴。其實，國體論本來就易與單一民族神話協調²⁵，故立基於國體論的《大日本帝國憲法》與《教育勅語》解釋亦可建構在單一民族

¹⁷ 在明治時期，有時「人種」亦具指涉 nation 的語意。參閱坂野徹，〈人種・民族・日本人：戰前日本の人類學と人種概念〉（《人種概念の普遍性を問う—西洋的パラダイムを超えて》竹澤泰子編，京都：人文書院，2005），頁233。

¹⁸ 關於近代日本的文化國族主義，可參閱鈴木貞美，《日本の文化ナショナリズム》（東京：平凡社新書，2005）。

¹⁹ 《福澤論吉全集 第四卷》，頁154。

²⁰ 具「自由探求之精神」與政治共同體意義的國民。參閱安西敏三，《福澤論吉と自由主義：個人・自治・國體》（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07），頁57-72。

²¹ 鹿野政直〈臣民・市民・國民〉《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 I》（東京：有斐閣，1970），頁243-246。

²² 同上，頁233-236。

²³ 尹健次，《民族幻想の蹉跎：日本人の自己像》（東京：岩波書店，1994），頁40。

²⁴ 尹健次，《民族幻想の蹉跎：日本人の自己像》，頁40、小熊英二，《單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畫像の系譜》（東京：新曜社，1995），頁54、55。

²⁵ 小熊英二，《單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畫像の系譜》，頁54。

國家的想像基礎上。

但隨著甲午戰爭的勝利、殖民地的取得，在「一君萬民」（「臣民」）理念與單一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下，該如何合理解釋統治異民族的現狀？如後述，發展出來的解決方法之一是，強調「日本國民性」中之「同化力」與「同化政策」的推行。所以，在殖民地臺灣，「涵養國民性」的論述亦開始被動員、操作（後述）。但討論此問題前，先看「國民性」論述在日本的展開。

3 「國民性」的創出與「國民文學」、文化國族主義

「國民」是個政治的範疇、概念，但「國民性」論述的發生當與「國民文學論」的流行、「國文學」這一學科的發明習習相關。亦如上述，「國民性」論述應是在日本的政治國族主義引導下發生的文化國族主義思潮中的一環²⁶。

首先，「國文學科」是在 1889 年從「和文學科」中分出的。奠定該科基礎並發明、撰述「國文學史」（日本文學史）的是該科第一期畢業生芳賀矢一（1867-1927）²⁷，他同時亦是撰述《國民性十論》（初版 1907），最先完整論述「國民性」者²⁸。但「國民性」概念的創出與流行與日本在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的勝利習習相關。本來，單就日本文學史來說，「國民性」概念群的流行亦不可能是芳賀矢一一人之力，而當是在甲午戰後發刊的《太陽》《帝國文學》展開之「國民文學」論的一個結果。

《太陽》是在甲午戰後，於 1895 年 1 月隨日本擴張機運而誕生的綜合雜誌。後來，高山樗牛（1871-1902）於 1896 年畢業於帝國大學哲學科後，1897 年當上《太陽》的主編，故井上哲次郎、外山正一等東大文學部雜誌《帝國文學》（與太陽同時期創刊）的投稿者亦在《太陽》活躍、紹介大量的德國思想、文化²⁹，而以高山為《太陽》主編時期（1897~1902）亦被認為是以「國民主義之論調」為特色³⁰。「國民性」概念群的出現當與強調特殊「文化」價值的德國思想、文化之流行脫離不了關係³¹，高山的「國民文學」中將自我的擴充與國家自我的擴充結合在一起理解本身亦有德國浪漫主義與有機體國家論的影子³²。事實上，留學德國的井上哲次郎是高山樗牛之師，皆屬前述《帝國文學》知識群體中之一員³³。

²⁶ 關於國語學與國文學之發明與近代日本文化國族主義之關係，參閱鈴木貞美，前引書，頁 81-147。

²⁷ 品田悅一，前引論文，頁 9。

²⁸ 芳賀所謂的「文學」則是近代意義 literature，是主要是指「語言藝術」，並透過對「國民性」「國民思想」之特殊性的強調來構築一國文學史（品田悅一，前引論文，頁 7-9）。

²⁹ 林正子，〈『太陽』に讀む明治日本のドイツ文明批評と自己探求——ドイツ關連記事と樗牛・潮風の評論を視座として——〉（《雜誌『太陽』と國民文化の形成》鈴木貞美編，京都：思文閣，2001），頁 464。

³⁰ 鈴木貞美，〈明治期『太陽』の沿革、および位置〉，《雜誌『太陽』と國民文化の形成》，頁 21。

³¹ 品田悅一，前引論文，頁 11。

³² 吉田精一，《近代文藝評論史 明治篇》（東京：至文堂，1981），頁 606。

³³ 兩人於 1897 年共同編纂《中等倫理教科書》，並成為雜誌《日本主義》的參與者，一起提唱「日本主義」（吉田精一，前引書，頁 605-607）。

後來，雖在 1899 年樗牛開始轉向尼采主義時，兩人開始有嫌隙³⁴，但樗牛的日本主義思想亦在一定程度上是來自對井上哲次郎國家主義思想的消化、吸收，甚至表現的更為激進³⁵。

對此，網島梁川在〈國民性と文學〉(1898)，提及在當時日本(明治中期)有「提唱國民性一派」的文學集團，並申論其反對意見，曰：

其の意におもへらく、國民性即はち國民の美質を描かざる小説は國民の性情を満足せしめざる小説なり、隨うてまた國民と為すなきの文學なりと(『太陽』第七號「小説革新の時機」參照)³⁶。

在網島梁川言及的〈小説革新之時機〉等文中，高山的確批判欲將文學從道德中救出的坪内逍遙之「文學獨立論」、「寫實主義」是蔑視「國民性情」的文學³⁷。對高山而言，理想的文學當是「國民文學」，而「國民文學」則是「基於國民性情之文學」，而文藝批評家的本務即在理解「國民之性情」。高山認為是日本的「國民性」(「國民之性情」³⁸)有：A「快闊樂天」B「尚武任俠」C「富道義情緒」D「以忠孝義勇為人道大本」E「重家系之繼紹、掛心國家之運命」F「以為君父而死為最高榮譽」³⁹、G 現世主義⁴⁰。

另一重要「國民性」論者芳賀矢一當是在「國民文學」論之脈絡中，如前述在德國思想的影響下開始使用「國民性」或類似語句的⁴¹。後來，在 1907 年，芳賀以「國民性」為書名，發表《國民性十論》。其中，他列舉十項「國民性」，分別為：a「忠君愛國」(討論內容為尊皇與武士道精神)b「祖先を崇び、家名を重んず」(祖先崇拜、家社會)c「現世的、實際的」(日本的神道、佛教、儒教)d「草木を愛し、自然を喜ぶ」(日本的庭園、藝術)e「樂天洒落」(桜、町人習俗等)f「淡泊瀟灑」(禪、繪畫、能樂、俳句)g「纖麗纖巧」(和歌)h「清淨潔白」(入浴習慣、神道)i「禮節作法」(中國、西洋與日本的禮儀規範)j「溫和寬恕」(只有防衛武力、與支那食人習俗對比)。若與高山之「國民性」論相較，其中 A-e、BCDE-a、E-ab、F-f、G-c 間有對應關係。兩人的「國民性」理解或有影響關係，但這皆亦可謂是他們的論述皆主要歸納自日本神話、歷史、文學、藝術的相關著作中，且是在與舊有的中國文化和新來的西洋文化對比、抽出的日本文化特質。此外，重要的是，他們皆將「忠君愛國」(BCDE-a)相關的性情視為日

³⁴ 前田愛，《幻景の明治 前田愛著作集第四卷》(東京：筑摩書房，1989)，頁 113-116。

³⁵ 前田愛，前引書，頁 125-128。

³⁶ 網島梁川，《梁川文集》(東京：日高有倫堂，1905)，頁 760-761。

³⁷ 高山樗牛，〈小説革新の時機〉(《樗牛全集 第 2 卷》東京：博文館，1912)，頁 440。

³⁸ 高山雖亦用「國民性」一詞(〈明治思想の変遷〉，《樗牛全集 第 2 卷》，頁 306)，但似偏好用「國民性情」。

³⁹ 高山樗牛，〈小説革新の時機〉，頁 441。

⁴⁰ 高山樗牛，〈明治思想の変遷〉，頁 306。

⁴¹ 事實上，芳賀亦欲以德國文獻學理解日本的「國學」，建構日本文學史(花森重行，〈國文學研究史についての一考察：1890 年代の芳賀矢一をめぐって〉《日本學報》21，2002，頁 72)。

本人的「國民性」。「忠君愛國」正是來自於井上哲次郎對於《教育勅語》的詮釋，是天皇制國家中教育思想的核心理念（後述）。

總之，芳賀主張這些日本的「國民性」是受「氣候風土之影響」外，亦是「根本的民性」⁴²，與一般的歐洲國民性論類似，從一種地理主義、本質主義的角度來理解「國民性」。但實際是透過對「國文學」材料的歸納與其他國家之「國民」相對比等方法制定的。就這點而言，「國民性」論述是建構在被發明的「國民」概念與「國文學」傳統之上，是近代日本的文化國族主義發展出來的一個概念與論述。但「國民性」論述的爆發性展開是在大正時期，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之後⁴³。故就外在環境而言，這當與日本因過去戰爭勝利而日漸增強的民族自信與一戰所帶來的經濟發展等習習相關。就日本思想史脈絡而言，則於在教育領域中之「國民道德論」的發展相關。

二 「國民性」論述的展開

1 「國民性」與道德教育：「國民道德論」的展開

1880年代「儒教主義」復興可謂是廣義「國民道德論」的開始，但狹義的「國民道德論」大抵是指日俄戰爭後，由井上哲次郎、穗積八束、吉田熊次等人所共同提唱的「國民道德」論述⁴⁴。井上之《國民道德概論》無疑是代表作。井上在1891年寫《勅語衍義》，在1899年又將《勅語衍義》增訂出版，然後在明治末期(1911)第二期國定教科書普及之際，寫《國民道德概論》(1912)，被選高等學校與師範學校的教科書⁴⁵。《國民道德概論》以〈教育勅語〉為前提而立論，成書時間雖與《勅語衍義》差二十年，但其中的核心思想連續。不過，在這二十年間日本已從近代民族國家成為擁有殖民地的亞洲帝國主義國家。而且，在這二十年間，井上亦完成其儒教三部曲⁴⁶，更進一步理解日本儒教思想。這些情況使井上越來越強調「忠孝一本」這一日本「國民道德」的固有性、優越性與其所根據之日本「家族制度」特性（後述）。

在《國民道德概論》中，井上清楚說明《教育勅語》則是「國民道德之粹」⁴⁷，將「國民道德」理解為依「國民性」（「民族的精神」⁴⁸）而形成、顯現的⁴⁹。在《國民道德概論》中，井上舉出13項日本的「國民性」，分別為1「現實性」、2「樂天性」、3「單純性」、4「淡泊性」、5「潔白性」、6「感激性」、7「應化性」、8「統一性」（「同化性」）、9「短氣性」、10「依賴性」、11「淺薄性」、12「銳

⁴² 芳賀矢一，《國民性十論》（東京：富山房，1907），頁95。

⁴³ 請參考附表1。

⁴⁴ 江島顯一，〈明治期における井上哲次郎の「國民道德論」の形成過程に関する一考察——『勅語衍義』を中心として〉（《慶應義塾大學大學院社會學研究科紀要》67，2009），頁24、25。

⁴⁵ 江島顯一，前引書，頁15、16、20。

⁴⁶ 井上哲次郎，《日本陽明學派の哲學》（東京：富山房，1900）、《日本古學派の哲學》（東京：富山房，1902）、《日本朱子學派之哲學》（東京：富山房，1905）

⁴⁷ 井上哲次郎，《國民道德概論》，頁11。

⁴⁸ 似乎在井上的語言中，「國民性」與「民族的精神」並無太大的意義區別。基本上，「民族精神」是總稱，具正面意義，而「國民性」則具數種項目、有好壞之別。

⁴⁹ 《國民道德概論》，頁10、22、28。

敏性」、13「狹小性」、14「虛榮性」等十四項目。在這十四項目中，前五項明顯對應於芳賀矢一《國民性十論》中之c至h項目，且在13項明確言及該書。相較於《國民性十論》大抵論述「國民性」之正面效果，井上則論述「單純性」、「淡泊性」、「潔白性」等好的「國民性」外，亦提出「短氣性」、「狹小性」等不好的國民性檢討，亦論「現實性」、「樂天性」、「感激性」等具正負兩面的「國民性」。他更從「感激性」（易接受刺激能力）、「應化性」（適應環境能力）、「統一性」（同化能力）這三種國民性來解釋日本何以能在近代西洋文明的衝擊過程中，不同於其他亞洲國家，維持國家之獨立。

井上之「國民性」論述雖晚於高山樗牛、芳賀矢一，但追本溯源，如前述，高山是井上之徒、芳賀所謂「忠君愛國」(BCDE-a)的「國民性」是來自井上之創作。井上雖未將「忠君愛國」解釋為「國民性」，但實際上，該概念是其「國民性」與「國民道德」論述中的基礎核心概念。基本上，「忠君愛國」可能首出於《勅語衍義》⁵⁰，後在許多修身書中使用⁵¹，直到1911第二期國定教科書制定之際，成為《修身》教科書中之標題而更廣為使用。再者，就其起源而言，該概念當來自井上自身在《勅語衍義》中展開的「孝悌忠信」與「共同愛國主義」（「共同愛國之義心」）這兩組道德概念的結合。「孝悌忠信」是傳統儒學道德，「共同愛國主義」則是古來東洋學術中幾乎不談的Patriotism的相關譯語⁵²。實際上，古代漢文中亦存在「愛國」這一語詞，但那大抵是指君主的愛國，而非是Patriotism所意指的人民的愛國⁵³。所謂「忠君愛國」就是在尊皇的前提下，要求人民「忠君」以表現其「愛國」之情的道德要求。那是把傳統東洋道德與近代西洋道德結合而成的明治新道德（〈明治知識〉）。

所以，井上重視「國民性」「國民道德」與「儒教」（「支那倫理學說」、「宋學」）等東洋道德間的關係。但那其實是發展自江戶儒學的特殊日本儒學。本來，在早期的《勅語衍義》中，井上就以儒教家族主義解釋《教育勅語》，欲統合「孝悌忠信之德行」與「共同愛國之義心」⁵⁴，成為其家族國家觀的原型⁵⁵。後來，井上透過其對江戶儒學研究的深化，從吉田松陰與後期水戶學之思想中提煉出「忠孝一本」的概念與邏輯⁵⁶。在《增訂勅語衍義》（1899）就主張日本的「國家」是「家族制」的，將「國」與「家」的關係理解為「擴充」的關係，曰：「家ニアリテハ、家長ニ服從シ、國ニアリテハ、其家長ニ服從スルノ心ヲ以テ國君ニ服從スルモノニシエテ、即チ孝ヲ擴充して、直ニ忠トナスヲ得ベキナリ、忠ト孝

⁵⁰ 《勅語衍義》，收入《井上哲次郎集 第1卷》（東京：クレス出版，2003），頁70。

⁵¹ 如《軍人読本：忠君愛國》（內藤燦聚編，東京：博文館，1892）等。

⁵² 「愛國」一詞主要是在明治初期才開始被洋學系統知識人作為Patriotism之譯語使用的。參閱山內育男，〈「愛國」という語〉（《參考書誌研究》第31號，1983）。又，感謝東京大學蒞部直教授提供該論文的相關消息。

⁵³ 山內育男，〈「愛國」という語〉，頁4。

⁵⁴ 《勅語衍義》〈敘〉，頁1。

⁵⁵ 石田雄，《明治政治思想史研究》（東京：未來社，1954），頁42。

⁵⁶ 《國民道德概論》，頁268-270。

トハ、其名異ニシテ、其實一ナリ、是故ニ是レヲ忠孝一本ト称スルナリ」⁵⁷。亦即「孝」與「忠」及「家」與「國」皆是「擴充」的關係⁵⁸，而「家族制度」就是「忠孝一本」這一「國民道德」的社會基礎。

後來，井上在《國民道德概論》中，將「家族制度」分為「總合家族制度」與「個別家族制度」，主張後者是前者的成立基礎，前者的代表德性是「忠」，後者則是「孝」⁵⁹。更將「忠孝一本」分為種五個層面來理解。1、如上述，將「忠」與「孝」的差異理解為量之大小的差異。2、將「忠」與「孝」理解皆出自「真心（まごころ）」，皆訓為「誠（まこと）」。井上強調這是後期水戶學《弘道館記述義》的理解方式⁶⁰。3、對家之「家長」盡孝即是在間接地對「國」之「君」盡忠。4、對天皇盡「忠」本就合於父母親、「祖先」之意志，故亦是盡「孝」。井上強調這是來自於日本萬世一系，無改朝換代的歷史特殊性。5、「日本民族」大抵是「天祖」的「末族」，「皇室」是「天祖的直系」、「國民的宗家」，故天皇是家長的家長，向天皇盡忠是「報本」，是「大孝」⁶¹。

總而言之，井上透過將「忠」與「孝」的差異量化，及發明「總合家族制度」與「個別家族制度」兩個概念，把「總合家族制度」理解為「個別家族制度」之血緣相聯的方式而建構其家族國家觀。家族國家觀基本上不同於社會契約論國家觀，而是以有機體國家論為背景，以擬制血緣關係為基軸所構築的國家觀。在此觀點中，以人類孝敬父母的自然心情為「忠君愛國」的心理基礎，但儒家的差別愛思想被等質化，使講求忠孝有別的儒學道德被改造為「忠孝一本」的愛國心⁶²。又，本來封建體制中的「君臣」關係亦被擴大為「君—臣民」的關係，「君」的理念與「忠孝」對象集中於天皇，以建構「家族國家」式天皇制國家⁶³。然而，井上對忠孝道德的創意改造並非全然獨創的，而是建構在江戶儒學的基礎上。本來，江戶社會與同一時期的明清中國社會結構本就不同，這造成儒學日本化的現象發生。簡而言之，在江戶的家社會中，與同時期中國重視父系繼承觀念的宗族或共有家計的生活共同體意義之家不同，江戶時代所謂「家（イエ）」並非是血緣集團，而如一企業，有一特定「家業」（如武士奉公於君），且允許異姓養子的存在與其繼承家督之權，而繼承該「家業」者當為維持「家業」與「家名」而活⁶⁴。再者，特別是在江戶武士階層的社會中，作為身為「主君」的大名所統治組織的「家」是由多數臣（譜代之臣）之「家」所共同構成的，而多數的臣（譜代之臣）之「家」中又有其所統管之臣（陪臣）的「家」。如此構成的江戶封建體制的「國家」結構實有如樹狀圖般，但又無如中國宗族中存在之一氣流貫的血緣關係，各個樹狀圖結構中的家業聯合共同體（「家職國家」）實如被大箱所套住

⁵⁷ 井上哲次郎，《增訂勅語衍義 卷下》（東京：文盛堂，1899），頁107、108。

⁵⁸ 在更早的《勅語衍義》就主張「一國」是「一家」的「擴充」（頁16）。

⁵⁹ 《國民道德概論》，頁222-224。

⁶⁰ 《國民道德概論》，頁269。

⁶¹ 《國民道德概論》，頁268-272。

⁶² 石田雄，《明治政治思想史研究》，頁8-13。

⁶³ 同上，頁23-25。

⁶⁴ 渡邊浩，《近世日本社會と宋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5），頁116-121。

的許多箱中又有許多小箱般，且彼此間是有距離並封閉的⁶⁵。

故在江戶時代的道德訓諭書中，不管有無血緣關係，努力奉獻於「家業」即是「孝」的行為⁶⁶。武士對家中之父（有可能是親生父親，亦可能是兄長或妻之兄長，或無血緣關係者）的「孝」自然就是「忠」於「家（イエ）」之「君」與「家業」的行為，更是與對家業聯合共同體中上層之君（將軍、大名等）的「忠」是連續的。是以，「忠」與「孝」所指涉的對象與其所意謂的精神態度常是一致的⁶⁷。所以，德川儒者用「忠孝」「君臣」等儒學思想解釋此種武士社會關係時，把中國朱子學中視為「義合」的君臣關係改為幾近「天合」的自然關係⁶⁸。

再者，在日本儒學（特別是朱子學）的君臣觀與忠孝邏輯中，亦出現「大義名分」的思想，一部分江戶儒學在大名與將軍之上再放置傳統的權威天皇，產生講求尊重天皇的「尊王論」⁶⁹。井上之家族國家觀正是使用江戶儒學所創作出「忠孝」與「尊皇」的話語，再加上擬制血緣關係的家族國家觀念所建構的。江戶時代「家社會」的結構與明治時代家族國家觀的差異就在「尊皇」觀念及以皇室為頂點而將全日本人連結在一起的擬制血緣觀念的有無。也就是說，隨著日本的近代化，封建體制中的「家社會」制度被改造為中央集權體制的「家族國家」。但實際上，近代日本的「家族國家」建構的過程中雖受有機體國家論等的影響，亦改造自產生於「家社會」中的江戶儒學。又因透過「忠孝一本」的理論發明，「孝」的德行可與「愛國」直接聯結。從而，儒學道德在國民國家體系中得到新生，成為「國民道德」，成為支持日本民族主義的一套「忠孝一本」論述。

井上哲次郎以如上的邏輯思考，在《國民道德概論》中主張家族國家觀，完成國民道德論體系，「國民性論」亦被統合入其中。相對於儒學人性論是針對普遍、個人的人性，國民道德論中所講的「國民性」則是「國民」這一特殊集團的性格。但在井上的「國民性」論中，吾人可看到其對儒學人性論的運用。首先，他舉 Schopenhauer 的思想外，亦舉荻生徂徠之性不變論主張「國民性」（「民族的性格」）的不變性（或說不易改變性）⁷⁰，但另一方面，他又認為「國民性」中有「善」有「惡」，如「感情的に激し易い」（「感激性」）「氣根が強くない」（短氣性）等是惡的，需靠教育來導正⁷¹。這一認知的背後恐是強調氣質可變的朱子學人性論與修養論、教育論。

因為在徂徠學的人性論中，「性」（「氣質」）被理解為一種在人類社會中營生的才能、資質，故是不可變但可發展的⁷²；而在朱子學的人性論中，「性」則被理

⁶⁵ 同上，頁 150-152。

⁶⁶ 同上，頁 142-147。

⁶⁷ 同上，頁 155-157。

⁶⁸ 同上，頁 81-84。

⁶⁹ 同上，頁 85-86。

⁷⁰ 《國民道德概論》，頁 301。

⁷¹ 《國民道德概論》，頁 301。

⁷² 荻生徂徠，《弁名》，收入《荻生徂徠 日本思想大系 36》（東京：岩波書店，1973），頁 240。或參閱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52），頁 87-91。

解為一種人類本有的道德能力，故是可回復的（「復性」），可變的⁷³。因為相對於基於「理」的「本然之性」，基於「氣」的「氣質之性」的善惡性質被認為是可變的。更正確地說，透過「持敬」「格物」的修養，導致惡的混濁之氣可清化、去除（「去人欲」），顯現本然之善性（「存天理」）⁷⁴。故在朱子學教育論中，教育目的即在於道德之精進，最終使之成為聖賢。在井上之「國民性」論述，吾人或可說，他同時操作朱子學與徂徠學之人性論以說明「國民性」之可變與不可變。吾人當然可質疑何以有些「國民性」是固定不變的，而有些是可變的。說到底，這完全是依自身擁護國體論、《教育勅語》之立場，操作儒學說與西方理論的結果。此種情況亦在其「同化」論中發現⁷⁵。

本來，立基於單一民族想像的《教育勅語》如何能成為後來統治多民族之帝國主義國家基本意識形態就是一個難題。面對此一難題當然有修正《教育勅語》的想法出現，但透過複雜的解釋亦可能某種程度合理化，井上選擇的方式是後者。首先，井上據人類學研究成果，承認日本人是「雜種」、「混成民族」⁷⁶。但其核心是「天孫民族」，其他組成日本民族的是「出雲」（來自朝鮮半島）「熊襲」（來自南方）「愛奴」「南清」⁷⁷。但其他民族皆被漸被「天孫民族」同化，而形成「日本民族」「日本國民」⁷⁸。現在隨著日本帝國領土的擴張又有其他「異民族」成為日本帝國之一部分，分別是①臺灣的支那人、②朝鮮人、③愛奴人、④臺灣的生蕃、⑤樺太的鄂羅克人、⑥樺太的尼夫赫人。井上認為這是「無勢力」的「戰敗者」之「國民」，必須藉由教育同化為「日本民族」，故「同化」政策是重要的⁷⁹。「同化」為維持《教育勅語》背後統一的「國體」想像、單一民族想像必須採取的政策。井上相信日本能順利推行「同化」政策之原因在於，他認為源於「天孫民族」的優秀同化能力已成為「日本民族」（「日本國民」）之「國民性」，故能順利吸收其他「支那」、印度、西洋等外來文明，亦能教化新進的異民族，進而同化之⁸⁰，使之成為以「皇室」為「宗家」的「日本民族」。所以，立基於單一民族想像的家族國家觀加上「國民性」論述與「同化」思想的話，可成為統合多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

按此理解，只要主動涵養「國民性」，就能被具優秀同化能力的「日本民族」同化，成為「日本民族」。故成為「日本民族」的最重要條件不是血緣而是「國民性」，或以「國民性」為基礎的「國民道德」。這基本上可能來自人人皆可能成為聖賢的朱子學樂觀人性論。只不過修養目標不是聖人，而是理想的日本「國民」（「臣民」）。正是在此意義上，「國民性」不單只是翻自〈近代西方知識〉概念，

⁷³ 《弁名》，頁 240、241。

⁷⁴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頁 22-29。又，1891 年他的第一篇儒學是研究論文即是性善惡論。

⁷⁵ 《國民道德概論》，頁 300。

⁷⁶ 《國民道德概論》，頁 66。

⁷⁷ 《國民道德概論》，頁 66、67。

⁷⁸ 《國民道德概論》，頁 70-72。

⁷⁹ 《國民道德概論》，頁 73。

⁸⁰ 《國民道德概論》，頁 363、364。

而是在天皇制國家中，由「國民」與「性」結合而成的〈明治知識〉概念，要求所有日本帝國內的子民成為理想的日本人，這包括本為外部的殖民地人民及內部的日本民衆。

井上哲次郎的《國民道德概論》以外，二戰前的道德教育觀點的國民性論，至少有《國民性と教育の方針》(1910)《國民性と大正の教育》(1913)等書⁸¹。因篇幅關係不再深論，但從上面對井上《國民道德論》的分析可知，「國民性」論述因「國民道德」教育的普及而深化。又，井上透過將儒學道德改造為「國民道德」，而去除儒學本有的普遍主義思想部分。

2 與「歐美列強國民性」的競爭

從大正時代開始陸陸續續有許多討論外國人國民性的著作出版，主要可分為討論歐美人國民性之作與討論中國人國民性之作。其中，論述歐美人國民性的有：《歐米列強國民性の訓練》(1913)、《米國國民性の新研究》(1916)《フランス國民性の研究》(1935)、《ロシヤ國民性の一考察》(1939)⁸²等。其中，有些是日本學者寫的，有些則是翻譯之作。這也反映近代日本的「國民性論」是約與世界同步的。其世界史背景大抵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與其後民族自決之風潮。坂井衡平亦指第一世界大戰是以民族、國民為單位的戰爭，「世界形成一個國民性的競爭場」⁸³。

在這個「國民性的競爭場」中，歐美人之國民性雖有差異，但似乎對日本人來說即是競爭者亦是正面的學習對象，是身為後進帝國主義國家日本改造「國民性」的模範。如野田義夫⁸⁴發表過《歐米列強國民性の訓練》(1910)，後亦撰寫《日本國民性の研究》(1914)。在該書中，野田認為日本人的國民性有「忠誠」(「忠君愛國」)「潔白」「武勇」「名譽心」「現實性」「快活淡白」「銳敏」「優美」「同化」「慇懃」。這大抵繼承芳賀與井上的看法，亦強調日本人具「同化」的國民性，且不只論日本人「國民性」的優點，亦指出「日本國民性」的缺點。如他指出「忠誠」之「國民性」缺點是會發生「排外思想」⁸⁵、「缺乏對公眾的道德」⁸⁶。在討論此點時，野田明顯是從歐洲人「國民性」對比的角度的來說的。故明顯地，他較井上更具比較研究的視野⁸⁷，且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特別從進化論觀點強調國際間生存競爭的情況，認為此次戰爭就是「國民性的戰爭」⁸⁸。又如中島力造亦從歐洲人競爭的觀點，提出在「國民性」教育中，修正缺乏「獨立

⁸¹ 參閱附表 1。

⁸² 參閱附表 1。

⁸³ 坂井衡平，《日本國民性論》(東京：大日本圖書，1922)，頁 28、29。

⁸⁴ 野田義夫稱井上哲次郎為恩師(《日本國民性の研究》東京：教育新潮研究會，1914，頁 32)，亦留學德國。

⁸⁵ 野田義夫，《日本國民性の研究》，頁 214。

⁸⁶ 同上，頁 219。

⁸⁷ 同上，頁 50、51。

⁸⁸ 同上，頁 5、6。

自營之精神」⁸⁹「忍耐持久之精神」⁹⁰等日本人缺點的重要性。

3 對「支那國民性」的批判

另一方面，亦有大量的論「支那國民性」的著作出版。首先，雖無直接用「國民性」一詞，但 Arthur Smith 所著的《支那人氣質》(1896)⁹¹當是在日本最早討論中國人「國民性」之論，其內容主要來自史密斯本人在中國的觀察。再者，明治末期，日本人亦開始至中國遊歷，書中多有論及中國人「國民性」者。其中，較有名的是，宇野哲人的《支那文明記》(1912)。該書中收有〈支那國民性論〉一文，或可說最早由日本人所著的中國人「國民性論」，似無受《支那人氣質》的影響。基本上，宇野之論來自於其親自到中國留學的見聞與其對中國古典、歷史、小說的研究。他從中歸納出「民主」「家族主義」「利己」「迷信」「誇張性」「附和雷同」「善社交」「同和作用」「保守」「服從心」「平和」「重社會」「態度悠然」十三項中國人特色，並無醜化之意。

但另一方面，吾人在內田良平《支那觀》(1913)中所收的〈支那國民性〉一文中，亦可看到對中國人「國民性」的負面批評。簡言之，內田分「讀書人社會」「遊民社會」「農工商社會」來論述，多是負面批評。如他認為中國革命所導致的動亂來自中國人「國民性的劣惡」⁹²。其他尚有服部宇之吉《支那國民性及國民思想》(1918)、《支那國民性と道教》(1917)、渡邊秀方《支那國民性論》(1922)後藤朝太郎《支那の國民性》(1926)等⁹³。此外，亦有左翼知識人的「國民性」論述，如佐野學在《解放》編的特集⁹⁴等。不過，以上問題因篇幅之故，不再細論。

總之，近代日本國民道德教育目的當是，使其自覺日本人特有的「國民性」及修正不好的「國民性」，以使其成為理想的日本「國民」。但這是同時在日本內地與臺灣等殖民地展開的，且可能在殖民地教育中被執行地更徹底。

三 日本帝國對臺灣的「同化政策」與「國民性」論述

一般而言，法國與日本的殖民政策皆是所謂的「同化政策」「內地延長主義」。但是，如矢內原忠雄所指出的，與重視「人權」理念且將人視為「理性所有者」的法國殖民政策相較，日本對臺灣的「同化」是民族、國家意義的「同化」。有強制賦予殖民地人民日本的「國民精神」之欲望、傾向⁹⁵。而且，就日本的情況而言，不管是「同化政策」或「內地延長主義」，其實際情況與內容會因時、地與人等因素而異（後述）。如駒込武分「國民統合」與「文化統合」兩個層次來

⁸⁹ 中島力造，《戰後の變動と國民性教育》(東京：目黒書店 1916)，頁 194。

⁹⁰ 同上，頁 202。

⁹¹ Arthur Smith，《支那人氣質》(東京：博文館，1896)。

⁹² 內田良平，《支那觀》(東京：黑竜會，1913)，頁 16。

⁹³ 參閱附表 1。

⁹⁴ 參閱附表 1。

⁹⁵ 矢內原忠雄，〈軍事的と同化的・日仏殖民政策比較の一論〉，收入《矢內原忠雄全集 第四卷》(東京：岩波書店，1963)，頁 299-301。

討論「同化政策」問題⁹⁶，但在近代日本統合為同一法律制度的「國民」，其政治權利也不一直都是平等的，還是需有所區別，以更清楚釐清「同化政策」的相關問題。又如在1914年成立的「同化會」所欲推行的「同化」，就臺灣人的認知而言，當主要是以〈法制的同化〉及〈政治權利的同化〉為目標的，故當時的學務課長隈本繁吉反對「同化會」的原因，即是該會所認知的「同化」旨趣與隈本等人所認知的同化（養成「國民性」意義的〈文化的同化〉）不同⁹⁷。又如原敬內閣提出的「內地延長主義」雖成為日本政府與田健治郎任總督時的總督府正式見解，但原敬與田健治郎兩人的看法實有差異，因為原敬的內地延長主義當是以〈法制的同化〉為優先且不強求〈文化的同化〉；相較之，田健治郎則認為要「實施與同一的法律、制度」的前提是在精神與文化上同化於內地人，故當「教化善導」臺灣人，「使之忠誠於朝廷、涵養對國家的義務觀念」，重視〈文化的同化〉優於〈法制的同化〉與〈政治權利的同化〉⁹⁸。

據上述，本文將「同化政策」分為〈法制的同化〉（→日本國民化，A）、〈政治權利的同化〉（→日本公民化，B）與〈文化的同化〉（→日本民族化，C）等三個層次來分析「同化政策」。從此角度來看，按矢內原忠雄的分析，法國的殖民政策在A、B方面較徹底，日本的則在C方面較徹底。還有，與日本內地接受同樣的物質文明等現代化有時也被理解為「同化」（→現代化，D）。以上，四種意義的同化或多或少其所涵蓋的意義範圍有所重複，但本文主要檢討的是C意義的「同化」，因為前述日本「國民性」中之同化能力指的正是此意義的「同化」，而這也是日本對殖民地「同化政策」的基調。從另一角度來說，殖民地統治的「同化政策」又可分為教育上的同化政策與政治上的同化政策。教育上的同化理念與政策一直是存在的，政治上的同化政策則約從併合韓國開始討論⁹⁹，在1919年的內地延長主義主張中定調的，而「國民性」論述主張出現於教育上的同化政策討論。以下，依此觀點檢討在1920年代以前（明治、大正時期）對於「同化」的諸種認知與政策。

1 明治時期（日本治臺早期）的「同化政策」

日本治臺早期的教育上的同化政策基本上有積極與消極兩種推行態度，以分別述之。

I 積極同化論：伊澤修二（1851-1917）

最初對於「支那人」的「同化」思想表現在國語教育政策方面。基本上，明治中期以前，日本沒有對其支配的異民族實施積極的語言教育政策，臺灣是國語

⁹⁶ 駒込武，《殖民地帝國日本の文化統合》，頁11-24。

⁹⁷ 隈本繁吉，〈本島人の同化に就いて〉（《臺灣教育》154，1952），頁13、14。

⁹⁸ 田健治郎傳記編纂會，《田健治郎傳》1932年，頁384、385。又相關分析，參見若林正文，《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 增補版》（東京：研文出版社，2001），55-58。

⁹⁹ 石井寛治，〈問題提起（日本資本主義と植民地）〉（《社會經濟史學》51(6)，1986），頁9。

同化教育之先驅¹⁰⁰。早期臺灣國語教育的主導者伊澤修二對於臺灣的統治，便認為除以「威力」征服其「外形」外，亦當征服其「精神」，「同化」於「日本人之思想」，使之成「新國民」¹⁰¹。伊澤之所以認為日本能在文化、精神上同化臺灣人有以下幾點判斷依據。

首先，伊澤認為臺灣「人民之能力與氣象」富「日本的貴象」¹⁰²。又，臺灣與日本為「同文之國」，共享「孔孟之教」，故容易使之「同化」¹⁰³。再者，臺灣在歷史上曾為日本所殖民過，地理上與日本相連，且「智德之量」亦幾乎與日本人相同¹⁰⁴。所以，對於臺灣人民的教化方針，他主張採用「混和主義」，即如同大英帝國占領本屬法國領地的加拿大方式¹⁰⁵。也就說，他將臺灣人（臺灣的「支那人」）與日本人的差異理解為如同一歐洲文化圈中之法國與英國的差異，語言雖不同，享有共通的文化。也因為語言不同，故「國語」教育是「融和」的第一步¹⁰⁶。並且他認為在臺灣使用《教育勅語》為教育指導方針時，當強調皇室的「一視同仁」，認為只要「服從」，即皆「臣民」¹⁰⁷。這與其欲「發揮忠君愛國之精神」「養成臣民之品性」的國家主義教育方向是一致的¹⁰⁸。亦即臺灣教育是在立基於國家有機體論的國家主義教育¹⁰⁹延長線上展開的¹¹⁰，臺灣被認為當成為日本身體的一部分¹¹¹。

如上，由於種種客觀地理、歷史的原因，伊澤樂觀看待屬同一文化圈的「臺灣一般人民」同化的可能性，但由語言差異，認為「同化」的第一步是執行「國語」教育。故伊澤任內制定的教育法規《臺灣總督府直轄國語傳習所規則》（1896年6月22日）¹¹²第一條即規定「國語傳習所ハ本島人ニ國語ヲ教授シテ其日常ノ生活ニ資シ本國的精神ヲ養成スルヲ以テ本旨トス」。此外《臺灣公學校規則》（1898年8月16日）中，第一條則是「公學校ハ本島人ノ子弟ニ德教ヲ施シ實學ヲ授ケ以テ國民タルノ性格ヲ養成シ同時ニ國語ニ精通セシムルヲ以テ本旨トス」¹¹³。可見日本治臺早期的「國語」教育雖具培養翻譯人材與吸收現代文明

¹⁰⁰ 長志珠繪，《近代日本と國語ナショナリズム》（東京：吉川弘文館，1998），頁75-102。

¹⁰¹ 伊澤修二，〈臺灣の教育〉（《伊澤修二選集》）（長野：信濃教育會，1958），頁587、588，首出於1895年。

¹⁰² 同上，頁585。

¹⁰³ 同上，頁586-588。

¹⁰⁴ 伊澤修二，〈新版人民教化の方針〉，《伊澤修二選集》，頁638、639，首先於1896年。

¹⁰⁵ 同上，頁637-639。又，「混和主義」是相對「自主主義」與「假他主義」而言。

¹⁰⁶ 同上，639。

¹⁰⁷ 伊澤修二，〈臺灣公學校設置に關する意見〉，《伊澤修二選集》，頁616，首先於1896年。

¹⁰⁸ 伊澤修二，〈本大臣に提出意見〉（《樂石自傳 教界周遊前記》東京：伊澤修二君還曆祝賀會，1912），頁142。

¹⁰⁹ 上沼八郎，《伊澤修二》（東京：吉川弘文館，1988，新裝版），頁162-166。

¹¹⁰ 據伊澤自述，這亦是第一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找他的原因（《樂石自傳 教界周遊前記》，頁205）。

¹¹¹ 伊澤修二，〈國家教育社第六回定會演說〉，《伊澤修二選集》，頁592、593。

¹¹²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 上》（《日本殖民地教育政策史料集成（臺灣篇） 28》東京：龍溪書舍，2008年），頁168-169。

¹¹³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 上》，頁229。又，1904年〈公學校規則〉有所改定，更改、確立「國語」與涵養「國民性格」間之因果關係（陳培豐，前引書，頁101、102）。

的實用目的，但養成「本國的精神」「國民タルノ性格」（本文視之為「國民性」概念群）亦是一重要目的。所謂「本國的精神」「國民タルノ性格」其實主要就是指尊皇愛國（「忠君愛國」）的精神與性格¹¹⁴。

不管如何，伊澤對於同化臺灣人的樂觀態度主要來自於他對於臺灣與日本是「同文之國」（共享「孔孟之教」）的認知。這樣的認知使他認為「孔孟主義」有利於日本的統治¹¹⁵。他認為可用訓讀方式教臺灣人讀四書五經及《幼學綱要》（依據日本「國體」與道德分類編排儒學經典語句而成的書籍）¹¹⁶。這主要是想用共通的儒學知識使臺灣人同化於日本的漢學文化與「尊皇愛國」的道德。事實上，伊澤在十八歲以前亦專攻「漢學」¹¹⁷，曾在高遠藩的藩校進德館學習。在伊澤學習時，進德館學風是屬和漢洋折衷的，而伊澤主要隨偏於徂徠學派學風的中村黑水與朱子學者海野喜左衛門學習「漢學」¹¹⁸。他對教育的積極與樂觀態度亦令人思及朱子學人性論中的樂觀主義。只不過，朱子學在教人為聖賢，而伊澤的國家主義教育、同化論則欲教日本人與臺灣人為「國民」（「臣民」）。但因為語言差異，伊澤令臺灣學生恭讀漢文版〈教育勅語〉並製作漢文版《勅語訓釋衍義》。伊澤似乎相信透過國語教育與熟習〈教育勅語〉等，臺灣人便能在精神層次成為日本人。這與前述井上哲次郎之觀點相較，主要差異在於不使用家族國家觀，但同樣立基於有機體國家論與儒學道德論，及同樣是以國體原理的存在為前提而立論的。

當然，此種利用漢文、儒教展開臣民教育的想法非是伊澤一人獨有，而是治臺早期參與教育人員一般的理解。如臺南縣知事對本島教育的具申書亦論道：

我教育勅語を奉讀するに、其の忠孝の道に於いては儒教と異なるを見ず。日本の大道を奉戴するは即ち儒教を信奉する所謂なるを悟らしむるを要す¹¹⁹。

然而，《教育勅語》中的「忠孝之道」是否同於臺灣知識人所熟知的「儒教」？對於此點，伊澤等積極同化論者似尚無深思熟慮，以致不去思考兩者之社會習俗的差異所可能導致的種種問題。還有，雖然教育家們描繪著積極同化的理想，但日本治臺早期的現狀是，因官員資質低落所導致的無秩序之暴力橫行¹²⁰。更重視此問題且試圖解決的是下述消極同化論者後藤新平。

¹¹⁴ 《臺灣總督府直轄國語傳習所規則》第十三條：「道德ノ教訓ハ皇室ヲ尊ヒ本國ヲ愛シ人倫ヲ重ンセシメ以テ本國の精神ヲ養成スルヲ旨トシ」（頁171）。

¹¹⁵ 伊澤修二，〈新版人民教化の方針〉，頁640。

¹¹⁶ 伊澤修二，〈臺灣公學校設置に關する意見〉，頁618-620。

¹¹⁷ 伊澤修二，〈大清出洋提學使諸公前之意見〉，《伊澤修二選集》，頁712。

¹¹⁸ 上沼八郎，《伊澤修二》，頁14-16。

¹¹⁹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 上》，頁35。

¹²⁰ 小熊英二，《〈日本人〉の境界：沖繩・アイヌ・臺灣・朝鮮殖民地支配から復興運動まで》（東京：新曜社，1998），頁73。

II 消極同化論：後藤新平（1857-1929）

伊澤修二與後藤新平對臺灣看法的差異之一是，伊澤將臺灣視為失而復得的新領土，後藤則將臺灣視為日本有史以來第一個殖民地及日本成為「國民的帝國主義」國家之起點¹²¹。這一差異在日本開始領有臺灣時就是大的論爭點，關係到臺灣如何統合到明治國家的問題。春山明哲就法制史觀點，將此差異理解為「內地延長主義」與「特別統治主義」的相克¹²²。雖然春山主要是以原敬與後藤新平的對立而論的，但這差異在某種程度亦左右伊澤與後藤對於如何統治臺灣之看法差異。只不過教育家伊澤的積極同化論是主要指〈文化的同化〉(C)，而政治家原敬的「內地延長主義」主要指〈法制的同化〉(A)。事實上，C意義的同化論者，也不一定同意A意義的同化，如伊澤便反對將明治憲法適用於臺灣¹²³。然而，對於此兩種意義的「同化」，後藤皆抱持消極態度。

一般而言，後藤新平任民政長官統治臺灣的時代（1898-1906），其政策基調常被理解為「無方針」、「尊重舊慣」，及「生物學」原理的統治¹²⁴。然則「無方針」並非真的「無方針」，而指需要「臺灣獨特的統治法」，而該統治是建構於以科學方法（特別是「生物學」）對臺灣民情、自然資源等的充分調查基礎上¹²⁵。亦即對後藤而言，新獲得的領土臺灣是與日本的制度、習慣極不同的地方，可謂在一種例外狀態中，故需尊重台灣舊慣。所謂「尊重舊慣」亦是基於其對臺灣社會存在的高度「自治之制」的理解與財政的考量¹²⁶，及基於「社會進化」原理的判斷¹²⁷。然則「尊重舊慣」並非是基於對台灣文化傳統的尊重，而基於其有利於統治的功利心態¹²⁸。再者，從後藤將日本人與臺灣人之差異比喻為「比目魚之眼」與「鯛之眼」的差異等，亦可看出其生物學知識與其統治構想間的關係¹²⁹。特別是後藤之殖民地統治論背後確實有進化論等西方理論的影子。這是從其早期著作《國家衛生原理》時既存在的面相¹³⁰。所以，他雖認為當給予臺灣人適度的教育，但認為對「社會進化」程度或說「民度」不同的人施予同樣的統治政策是愚蠢舉動¹³¹。亦即後藤認為當按「社會進化」的自然秩序來進行教育與統治。這大抵如眾多研究所注意到的，構成其政策思惟的基調¹³²。然則「生物學」原理不僅是合

¹²¹ 後藤新平，《日本植民論》（東京：公民同盟出版部，1915），頁12。

¹²² 春山明哲，《近代日本と臺灣：霧社事件・殖民地統治政策の研究》（東京：藤原書店，2008），頁230。

¹²³ 小熊英二，《〈日本人〉の境界：沖繩・アイヌ・臺灣・朝鮮殖民地支配から復興運動まで》，頁129。

¹²⁴ 這一理解主要基於後藤對兒玉源太郎所述之臺灣統治論。其內容參見鶴見祐輔，《決定版 正傳後藤新平 第三卷》（東京：藤原書店，2005），頁38、39。

¹²⁵ 後藤新平，《日本植民論》，頁24。

¹²⁶ 後藤新平，〈臺灣統治急務策の意見書〉（收於《後藤新平文書》，1898年1月25日）。

¹²⁷ 後藤新平，《日本植民論》，頁51、52。

¹²⁸ 溝部英章，〈後藤新平論——鬭争の世界像と“理性の独裁”——〉（《法學論叢》101卷第2號，頁81）。

¹²⁹ 鶴見祐輔，《正傳 後藤新平 第三卷》，頁39。

¹³⁰ 溝部英章，〈後藤新平論——鬭争の世界像と“理性の独裁”——〉頁67-75。

¹³¹ 後藤新平，〈最近植民政策〉（《同志社時報》115，1914），頁2、3。

¹³² 例如：春山明哲，《近代日本と臺灣：霧社事件・殖民地統治政策の研究》，頁336。

理化對殖民地人民差別對待的統治思想，亦是基於將人視為本能地追求「生理的圓滿」之生物的思想。就此層次而本土的日本人與殖民地人民皆是同樣原本處於鬭爭世界中，是受生理動機所支配的存在，需服從「理性獨裁」的國家之法，以獲得「生理的圓滿」¹³³。也就是說，對後藤而言，殖民地臺灣的人民是「民度」低的異民族但亦同樣是受生理動機支配的存在，故藉由給與「生理的圓滿」而可使之感到「幸福」¹³⁴。

按上述思惟，後藤認為日本初期對臺灣統治政策雖非是「內地延長主義」的，但也是一種模倣法國統治阿爾及利亞的「同化政策」¹³⁵。他從生物學的觀察、法國「同化政策」的失敗與「生蕃」「土匪」的橫行、Gustave Le Bon 的人種主義、本質主義式的反同化論主張¹³⁶，認為欲在臺灣施行憲法的「內地延長主義」式的「同化政策」（法律與政治權利上的同化）是不切實際的¹³⁷。再者，後藤雖可反對將《明治憲法》適用於臺灣，但並不能反對國體原理在臺灣的適用性，故表面上他沒有否定將臺灣人「同化」的可能性。但實際上，他認為透過「國語」的普及來改變語言尚難在二、三代內完成，更何況要讓臺灣的「支那民族」改變其「風俗習慣心性」¹³⁸。對於此一矛盾，如陳培豐所指出的，他以「差別即平等」這一進化論的態度來看待¹³⁹。又，後藤認為「同化」一詞具多義性，點出「同化」一詞的修辭性，及「同化」思想背後可能潛藏的某種偽善性。¹⁴⁰

如上，後藤不僅反對〈法制的同化〉，對於〈文化的同化〉，亦只是在不抵觸國體論前提下，表面消極肯定之而已。但重要的是，從這些後藤的陳述，吾人可看到一種愚民意識與相當理性的現實主義思惟。其實，後藤曾說：「政治之要在善乘人之弱點」，認為殖民政策即是要知「土民」的習慣，乘其弱點，使其如化於皇德之中。後藤並承認此看法其實類於馬基維利之言¹⁴¹。有意思的是，在另一文中，後藤主張「宗教乃乘人生弱點之物」，但因日本殖民臺灣時無適當的宗教可利用，故以「衛生上的設備」（醫療等守護人民生命的知識、設備）取而代之¹⁴²。這完全是一種政治當利用宗教的江戶武士、儒者常見的思惟，是近代日本創造出「國體」原理與論述的原因之一，亦令人思及荻生徂徠以「敬鬼神」為「術」為聖人陰謀的思想¹⁴³。

¹³³ 溝部英章，〈後藤新平論——鬭爭の世界像と“理性の独裁”——〉，頁 82。

¹³⁴ 同上，頁 82。

¹³⁵ 後藤新平，〈日本植民論〉，頁 18。

¹³⁶ Gustave Le Bon 認為「異種國民」因「心的組織」（「民族心理」）不同，故不能共用同種法律（後藤新平，〈日本植民論〉，頁 53）。

¹³⁷ 後藤新平，〈日本植民論〉，頁 46-51。

¹³⁸ 後藤新平，〈後藤長官の訓示〉（《臺灣教育會雜誌》27，1904），頁 3、4。

¹³⁹ 陳培豐，前引書，頁 115。

¹⁴⁰ 後藤新平，〈後藤長官の訓示〉，頁 4。

¹⁴¹ 後藤新平，〈臺灣の統治〉（《後藤新平論集》東京：伊藤元治郎，1911），頁 164，首出於 1905 年 10 月。

¹⁴² 後藤新平，〈日本植民論〉，頁 23。

¹⁴³ 渡邊浩，〈「教」と陰謀——「國體」の一起源〉（《韓國・日本・「西洋」——その交錯と思想變容》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05），頁 373-411。

再者，後藤對於「同化」的看法不具伊澤那種樂觀的理想性，亦令人想起荻生徠徠對朱子學批判，故或可說後藤的殖民地統治論是徠徠學式的，不偽善但具某種權謀性格。這或許後藤在徠徠政治思想滲透的〈江戶知識〉與武士社會中形成其思想有關，或亦可說是荻生徠徠與後藤新平之思想皆在某種程度反映、承繼江戶武士運作政治的現實主義性格¹⁴⁴。正是在此意義上，後藤新平的政治思想並非全來自近代西方思想，而是在某種程度與伊澤不同的方式繼承混雜漢學知識與武士特質的〈江戶知識〉。後藤新平與伊澤修二的共通點就是他們皆具有機體的國家觀，及其漢學知識皆相當紮實¹⁴⁵。然而，後藤比伊澤更自覺到「國體」的虛構性，從而欲以在殖民臺灣時，以具體的「衛生上的設備」取代或補助在「國體」功能。這樣的判斷當然亦是來自其對日本與臺灣之社會習慣差異的理解之上。

總之，後藤因其所繼承的〈江戶知識〉的基礎上，在經由〈近代西方知識〉的包裝、加工而展開其殖民思想的，對於「同化」抱持消極態度。這一態度基本上亦為其栽培的學務課長持地六三郎所繼承¹⁴⁶。這種消極同化論在持地在臺期間（1900-1910）當是教育政策的基調，阻擾了伊澤所欲推行的積極同化教育構想之實現。

2 大正時期的「同化」政策與「國民性」

後來接替持地六三郎任總督府學務課課長（1912年昇格為學務部）是隈本繁吉。隈本主導〈公學校規則〉的改定。強調「國語」是「我國民的精神」居宿之所在，因此和「修身」相配合，「國民性格的養成」應該占有特殊的地位¹⁴⁷。這標示教育當局的教育思想至少表面上從〈消極同化〉轉向〈積極同化〉，從而亦影響課程規劃與教科書編纂。首先，在隔年（1913），「修身」課程從「國語」中獨立，且「國語」中有關日本精神之教育內容亦增加¹⁴⁸。再者，同年（1913），在隈本繁吉主導下，招聘芳賀矢一來臺擔任公學校教育講習會講師。即請「國語」「國文學」「國民性」教育發明者來當殖民地製作理想「國民」的教師，講述國語與國民性之關係¹⁴⁹。實際上，亦是從隈本擔任學務課長開始，臺灣開始出現有關「國民性」的話語¹⁵⁰，欲強化涵養「國民性」教育。

如上述，大抵在大正時代後，不管論者的本心如何，統治當局的教育政策轉

¹⁴⁴ 荻部直亦指出後藤之思想與主張「勢いに随ひ理亦同からず候」的橫井小楠思想有共通點（〈帝國の倫理：後藤における理想主義〉，《時代の先覺者 後藤新平》東京：藤原書店，2004，頁84）。而且，就學脈來講，後藤新平當是屬朱子學派的。但容筆者再補充一點，所謂「朱子學派」、「古學派」等是近代學者的分類，故不當從是學派分類去認識一個江戶知識人的思想。事實上，荻生徠徠與橫井小楠這兩大思想巨人同具現實主義的思惟，相關分析參見平石直昭，〈主体・天理・天帝—橫井小楠の政治思想-1-〉（《社會科學研究》25(5)，1974）等。

¹⁴⁵ 鶴見祐輔，《決定版 正傳後藤新平 第一卷》，頁100-110。

¹⁴⁶ 陳培豐，前引書，頁136-143。

¹⁴⁷ 臺灣教育會，〈臺灣公學校規則改正せらる〉（《臺灣教育》128，1912），頁7。

¹⁴⁸ 陳培豐，前引書，頁245、246。

¹⁴⁹ 陳培豐，前引書，頁249-252。

¹⁵⁰ 附表2。

向〈積極同化〉，就連持地六三郎亦然¹⁵¹。這當是辛亥革命、第一世界大戰等外部原因所促成的民族自決、「國民性」競爭的風潮所導致的。另一方面，應亦與隨著日本帝國的擴張，台灣在日本帝國的戰略地位從南方防衛基地轉成南進攻擊基地有關。這些原因迫使隈本等殖民地教育官僚更加相信具優秀「國民性」的「大和民族」強大的「同化力」，及對臺「同化」的可能性與必要性。也就是說，隨著日本帝國的擴張，台灣在帝國內部的位階逐漸升高，從而必須更像日本人。故大抵在大正以後，特別是在第一次世界戰後，積極的「同化政策」已成治臺政策的主軸。但是，必須區別清楚的是，殖民教育當局所認定的「同化」是〈文化的同化〉，主要目的為「國民性」的涵養¹⁵²。例如：在1922發布修正的〈臺灣教育令〉中，第四條是：「公學校ハ……國民タルノ性格ヲ涵養シ國語ヲ習得セシムルコトヲ目的トス」¹⁵³。在此過程中，「內地延長主義」有時亦被理解為強迫「同化」的邏輯與主張。

但在殖民地教育中，對涵養「國民性」的重視亦非皆出於同化臺灣「新附民」之動機。另一種動機是，基於對在臺出生的日本人（「灣生」）喪失日本「國民性」的擔憂¹⁵⁴。本來，涵養「國民性」教育就是同時在日本內地與臺灣等殖民地展開的，但在臺灣展開的涵養「國民性」教育是其「同化政策」之一環，有其目的與方法的特殊性。

3 「同化政策」與涵養「國民性」方法論

關於涵養「國民性」的方法，筆者以為總督府的策略有兩個面相。一是負面宣傳「支那國民性」，一是透過各種教育手段涵養「日本國民性」。

I 批判「支那國民性」

在《臺灣日日新報》中有如下許多有關「支那國民性」的連載文章。首先1912年宇野哲人出版《支那文明記》，書中有〈支那國民性〉一文，在同年5月16《臺灣日日新報》則刊載該文的摘要。有意思的是，基本上，宇野之論是從其對中國古典與歷史研究中，歸納而出的十三項中國人特色，並無醜化之意。但在《臺灣日日新報》刊的摘要則是，「孝行から蓄妾」「利己主義の標本」「李鴻章の門番」（批評收紅包）「風水先生の勢力」（批判迷信）「油斷のならむ國民」（批評善辭令）等負面「支那國民性」論¹⁵⁵。

再者，在日本內地有關「支那國民性」的討論亦是在1912年左右開始增加，

¹⁵¹ 陳培豐，前引書，頁263。

¹⁵² 潤菴生在〈同化問題之管見〉（《臺灣日日新報》1917-06-17）中主張：「同化之大莫大於涵養忠君愛國之國民性」。川崎卓吉在〈同化主義の理想まで〉（《臺灣日日新報》1920-01-01）中強調統治臺灣的官僚共識是以「同化主義」為理想，但在實行時採「便宜主義」。重視「國民精神」的涵養。

¹⁵³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 上》，頁35。

¹⁵⁴ 在明治時期已有人表達此一憂慮（〈臺灣在住の小學兒童（上）〉，《臺灣日日新報》1906-2-6）。

¹⁵⁵ 六年後，宇野哲人又在同報紙寫〈支那國民性六論〉（《臺灣日日新報》，1918-08，先刊漢文，後又刊出日文版），主要論中國雖已革命，但國民自覺未徹底，需普及教育。

臺灣報紙對此議題似乎一開始就非常關注。所以，在大正時期的臺灣報紙中，出現許多對「支那國民性」評論文章，其批評的共通點是中國人的「利己主義」「利己心」¹⁵⁶。不言而喻，在這些評論中，所凸顯對比的是《教育勅語》所說的「義勇奉公」及「國民性」論中之「忠君愛國」性格。此種〈公與私〉的對比正是一般「國民性」論的主流論調、旋律。他們期待透過此種旋律反復撥奏，能在不知不覺間讓臺灣人嫌惡自身承襲自祖先不好的「國民性」，成為「忠君愛國」的日本人。

然而，如柴田廉中所指出的，企圖以此種方式來進行同化政策者皆是教育家、教育行政官、警察等，只是以淺薄的常識觀察，而沒有深入理解臺灣社會的風俗習慣¹⁵⁷。如此的「同化政策」從一開始便注定是難以成功的。儘管如此，殖民地官僚們亦想出各種「涵養國民性」的方法，以下簡略論之。

II 「涵養國民性」的各種方法

i 國語教育

國語教育是在明治時期，伊澤修二已提出的最基本方法。後來，如在《臺灣日日新報》中〈國語談話會〉(1914-10-15)一文中所言：「國民性之涵養」非待「國語教育之普及」。為普及國語教育，則除一般正規學校上課或講演活動外，亦有人提出「國語夜學會」「國語普及會」等社會教育的方法。特別是約在1910年代後，當地當局開始以學校及派出所為單位，半強制招集未就學的青少年，每天晚間以臺語的直譯方式，由教職員或警察義務教授國語¹⁵⁸。

ii 修身與宗教的教育

除國語教育外，修身教育亦是重要的。這反映在1913年以後修身教育從國語教育中之獨立分出與增加。亦有人注意到日本與臺灣流傳的兒童故事的差異影響到「國民性」的差異，從而促使政府注意該問題¹⁵⁹。另外，神道相關之宗教設施的普及化亦被認為涵養臺灣人之「國民性」的重要手段¹⁶⁰。反之，亦有如長老教會的中學教育被認為是違反「國民性涵養」之教育¹⁶¹。

iii 社會教育與習俗的改造

¹⁵⁶ 如在《新報》〈大和民族之天職大帝國主義(其五) 支那之國民性〉(1916-01-29)一文中，作者大批評中國為「純然為利己主義之民族」，缺乏「政治之公德」「以身殉義之國家精神」等。再者，樋口秀雄在〈支那の國民性三論〉(1916-03-09、10、11)亦從中國人之下層階級無關心政治，「實利主義」「功利主義」「個人主義」、適合少數者統治的精神樣態等，論中國雖有「共和政治」革命發生，但適合專制政治。又，如後藤朝太郎在〈支那の國民性九論〉(1918-9、10)中論述「支那人國民性」是「複雜多樣」、有南北之差異，但其共通性是「利己心」強，並指出那是在歷史過程中馴化而來的利己的處世法等。

¹⁵⁷ 柴田廉，《臺灣同化策論》(臺北：成文出版社，1999)，頁28、29。

¹⁵⁸ 中越榮二，《臺灣の社會教育》(臺北：臺灣の社會教育刊行所，1936)，頁9。例如在《新報》中就有〈地方近事 / 臺中 國語夜學會開設〉(1916-12-10)一文，曰：「今同后里庄の有志者相計り國民性の涵養並に國語普及の目的を以て同地公學校内に國語夜學會を開設し」。

¹⁵⁹ 武內貞義，〈日本と臺灣之昔話〉(《新報》，1928-05-01)。

¹⁶⁰ 臺北地方法院長安井勝次，〈新春の希望 宗教に向つ〉(《新報》，1917-01-01)。

¹⁶¹ 〈國民性教育に背馳する 長中の存在を許さぬ 臺南同志會ご決議 監督官廳の善處を促す〉(《新報》，1934-03-06)。

在社會教育的層次，除「國語普及會」等國語教育組織外，「同風會」「天然足會」、「國語普及會」、「矯風會」或「敦風會」等各種教化團體出現。例如1903年宜蘭成立「同風會」，1914年臺中設立「風俗改良會」，以矯正冠婚葬祭和其他一般風俗為目的¹⁶²。1920年臺灣地方制度改正後，各地方「同風會」以州為單位形成新的教化機關，如新竹州「庚申會」等。但「同風會」等對社會習俗的改造往往只是改變其外形，亦會造成如喪葬儀式一半日本式、一半臺灣流等奇怪現象¹⁶³。

iv 皇太子的巡禮

昭和天皇在還是皇太子時，曾於1923(大正12)年4月來臺灣待十天(16到27)左右，曾到過臺北、新竹、臺中、臺南、高雄、屏東與澎湖，並送勳章給辜顯榮、林熊徵等士紳¹⁶⁴。之後，田健治郎總督撰寫〈穩健著實なる國民性の陶冶訓練に一層の努力へを拂へ〉(1923-06-17)認為皇太子的來臺巡禮有助於去除因「民族性」差異所產生的障害物。從此看法可窺見總督府對於皇太子的巡禮所期待「國民性之陶冶」效果。

其他還有如馴化身體的體操、唱歌等手段，但因篇幅限制，不再深論。總之，在大正期間，總督府企圖用各種方法來涵養臺灣人「國民性」以同化之，使其能認同日本。但基本上無太大進展¹⁶⁵。後來，隨著日本政黨政治的結束，軍部的抬頭，約在1936年左右同化政策開始轉換為更為強勢的皇民化政策¹⁶⁶。不管如何，「同化政策」的失敗一方面是因統治當局對於所欲改變的臺灣習俗不理解，一方面也與臺灣人自身的抵抗相關。不過，話又說回來，臺灣人並非全對涵養「國民性」的同化政策一直抵抗的。

四 1920年代前臺灣知識人對「國民性」論述的接受、抵抗

1 日治時期臺灣知識人對「國民性」論述的接受

對於總督府主導的「同化政策」中之涵養「國民性」要求，有許多臺灣知識人是積極回應的。新竹士紳周維金是其中一人。周在〈涵養國民性十論〉(《新報》，1918)¹⁶⁷，認為在競爭的時代中，國家要強，要立於優勝地位，其國民必須「涵養國民性」(《新報》，1918-08-29)。又認為要「涵養國民性」必須「察各國國民性」(1918-08-30)，故考察英國、德國等國國民性。又，他認為要「涵養國民性」以維持「高尚的品格」成為「雄健之國民」有十種當做之事，包括「立志」「習業」「節養」「忠誠」「義勇」等(1918-09-12~1918-09-21)。其中，對於「忠誠」，周曰：「夫國者，民之所天也。民之所托於國猶婦人之托於

¹⁶² 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頁1018。

¹⁶³ 柴田廉，《臺灣同化策論》，頁96、97。

¹⁶⁴ 緒方武藏編，《臺灣大年表》(臺北：臺北印刷株式會社，1938)。

¹⁶⁵ 柴田廉，《臺灣同化策論》，頁11。

¹⁶⁶ 深川文教局長，〈為期國民精神振興 徹底同化開協議會 來廿五日由文教局主催〉(《新報》，1936-07-18)等。

¹⁶⁷ 十論所分別發表的時間，請參閱附表2。

夫也。婦人之愛其夫。世界萬國皆同，故民之愛其國」(1918-09-21)，從傳統明清中國中，妻以夫為「天」的觀念來理解「民」與「國」間的關係。相當有趣！更有意思的是，周從儒學人性論與修養論，主張「學力之深淺為人品之高下」，「學愈全，則人愈聖，人愈聖，則位愈尊，於是政治上之階級，不能不有分辨也。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就此而推之，學成然後國民有獨具之特質，自能立於世界」(1918-09-28)。這段文字的重點是，周將「國民」放置在傳統儒學中「聖人」的高度，把「國民性」理解為如聖人所具之理想人性。從而，周主張在「同文同種」基礎上，「獨國民性缺其修養」的「吾同胞」(指本島人)當「涵養國民性」以「同化」為日本人(1918-09-29)。

如上，在周的論述中，以一種隱喻方式將日本人放置在聖人的高度，並把「國民性」理解為理想的人性。這無疑是一種用儒學思考來正面理解「國民性」論的方式，但不是唯一的。

在崇文社所辦的作文競賽中，有題目為「國民性涵養論」者，其中第一到第五名的五篇文章刊出於《臺灣日日新報》。在這五篇中，第一名作者陳永諧曰：

是故為民者當盡其為民之責，必具其國民之性而後可。……同是民也，而有國民殖民之分。何謂國民，曰天使我為民，而吾能盡其為民者也。何謂殖民，曰天使吾為民，卒不成其為民者也。故殖民無權利，而國民有權利。……殖民性尚粉飾，國民性重文明(1920-03-16)。

整篇文章對仗工整，可說是篇好文章，然其所論之義理更有意思。他也是用儒學思考將「國民性」視為一種理當修得的理想德性，又從近代「權利」與「文明」的高度去肯定涵養「國民性」之意義。認為被殖民的臺灣人當涵養「國民性」以獲得文明的心性。這大抵亦是其他作者共通的理解。

再者，在關西公學校教師劉家均所發表的〈國民性の涵養と臺灣教育〉一文中，吾人可看到對日本國民性論背後的家庭國家觀與「忠孝一本」觀念有較深入的理解。首先，劉感嘆本是「支那民族」的「島民」不理解何為「國體」，兒童竟有當皇帝的夢想¹⁶⁸。對於國體，他清楚理解「國體」是立基於「萬世一系之皇統」，日本帝國以皇室為中心而構成一個「血族國家」、「一大家族」，並說明在這家族中，皇室是「宗家」、天皇是皇室的家長及國民全體的大家長，故君臣關係如父子關係¹⁶⁹。在對家庭國家觀的理解下，劉舉前述的芳賀矢一與井上哲次郎等的國民性論，說明「日本國民性」之長短處(主要是長處，特別是「忠君愛國」)後，強調臺灣人是與「古來的臣民」「異祖異宗的民族」不同，故當「涵養國民性」¹⁷⁰。為此，他提出組觀光團到內地觀光，及教育者的模範作用等方法，認為除學校教育外，更要重視社會教育，認為要養成「尊皇愛國之精神」的最好方法是「以禮樂教化之道」使島民心服¹⁷¹。

總之，如上述，在儒學思想媒介下，「國民性」被部分臺灣人理解如聖人心

¹⁶⁸ 劉家均，〈國民性の涵養と臺灣教育〉(《教育論文集》，1922年)，頁95、96。

¹⁶⁹ 同上。

¹⁷⁰ 同上，頁97-101。

¹⁷¹ 同上，頁100、101。

性及文明心性等正面理想的性格，從而試圖接受、習得之。所以，在1930年代的皇民化政策展開前，至少在表面話語層次，在儒學思惟的媒介與對「文明」的渴望下，就有部分臺灣人在國族認同方面，被「國民性」論述所馴化，在文化與政治的認同方面皆趨向日本統治當局，以成為日本人為目標。

2 日治時期臺灣知識人對「國民性」論述的抵抗——以蔡培火之論為中心

在1910、1920年代，臺灣知識人最活躍的知識場域當是由當時臺灣人所創的唯一報刊《臺灣青年》(1920/7~1922/2)與後繼的《臺灣》(1922/4~1924/6)《臺灣民報》(1923/4~1930/3)。在這十年左右的系列報刊中，以「國民性」為題的文章只有〈日本國民性與臺灣統治策〉與羅素〈中國國民性之幾個特點〉兩篇文章。前者是早稻田大學教授內崎作三郎所寫的，批判性地論及「日本國民性」問題。後者則試圖客觀陳述「中國國民性」的優缺點，非一味批評。包括創刊《臺灣青年》的主要參與者林獻堂、林呈祿、王敏川、彭華英等人的投稿文章大都不言及「國民性」。這顯示20年代主導言論的臺灣知識人對於總督府所主導的同化政策中之「國民性涵養之事業」是採取消極應對的態度。以沈默來表示其抵抗態度。

然而，在上面提及的創刊《臺灣青年》中的一人蔡培火可能由於其專業是教育之故，最意識到「國民性」論問題。後來，他在1928年左右，對「國民性」論述展開最積極且有意義批判。本來，蔡的思想就與林呈祿等自治主義思想的主導者不同，不直接否定「同化政策」。對於「同化政策」，蔡在《臺灣青年》第一卷第二號發表《吾人之同化觀》(日文版)，並於第三號發表同論文的漢文版。他將「同化」分為「自然的同化」與「人為的同化」，認為「自然的同化」最終必然實現「四海兄弟之理想」，而帝國主義的殖民與對異民族的「同化政策」則是一種「人為的同化」¹⁷²。對於後者(「人為的同化」)，蔡又分為「極端之本國中心之同化政策」與「根據自然的同化之理法」的「人道主義之同化政策」理解，認為前者不可行，後者有效但難以實現¹⁷³。然後就上述分類，雖未明言，指涉日本對臺灣的統治方針乃「極端之本國中心之同化政策」，故不會成功。相對之，他推薦「人道主義之同化政策」，以實現「四海一家之理想」¹⁷⁴。

在蔡的上述同化觀中，可見其重視人道主義與四海一家思想的影響。本來以儒學中「四海之內皆兄弟」(《論語·顏淵》)等思想為媒介，明治基督教思想中，就存在強調「四海兄弟主義」¹⁷⁵這種重視現世倫理、人類同胞愛的思想傳統¹⁷⁶。

¹⁷² 蔡培火，《吾人之同化觀》(《蔡培火全集 二》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0)，頁37-42。

¹⁷³ 同上，頁44-45。

¹⁷⁴ 同上，頁46-49。

¹⁷⁵ 宮崎滔天，《支那革命物語》(《宮崎滔天全集 第1卷》，東京：平凡社，1971)，頁295。

¹⁷⁶ 山路愛山在《現代日本教會史論》中，論及「四海同胞主義」思想以中村正直為代表，是「基督教化せられたる儒教主義」、或「儒教を以て説明したる基督教」。另外，如明治的基督教信徒亦是社會主義者的片山潛亦有此種思想(參閱大田英昭，《日本社會民主主義の形成：片山潛とその時代》東京：日本評論社，2013，頁77-88)。

蔡培火透過其師植村正久的教導，亦置身在此思想傳統中¹⁷⁷，只是似乎更強調「四海兄弟主義」源自儒學的意義¹⁷⁸。不管如何，「四海兄弟主義」（四海同胞主義）是儒學與基督教所激盪出的普遍主義思想，在近代東亞思想史中具極重要意義。正是基於此種普遍的人類同胞愛思想，蔡追求一種體制內人道主義意義「同化」的可能性，而此意義的「同化」當包括政治權利意義的「同化」，故他從事於追求平等自由之政治權利的議會成立請願運動。然此一運動又是反「極端之本國中心之同化政策」（文化的同化）的。

在後來成立「御用派」與「反同化」的「祖國派」與「臺灣派」這一分類¹⁷⁹中，蔡是反同化的「臺灣派」。故早在 1920 年寫的〈我島與我等〉中，蔡曰：「臺灣乃帝國之臺灣，同時亦我等臺灣人之臺灣」¹⁸⁰，在政治上承認「帝國」統治臺灣的前提下，表明「臺灣人」（「本島人」）的身分認同意識。但其所謂「本島人」或「臺灣人」常與「漢民族」連用，故「本島人」意識亦終歸於「漢民族」（「漢族」）意識。

或許在此種「漢民族」意識基礎上，蔡寫「漢族之固有性」一文。

夫性謂何？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是謂人出自天，賦受其命，其所稟命即是人性也已。……竊思夫天命中，中直接有間接，直接之命為吾人之先天性；間接之命是吾人之後天性也。先天之性則為人類所共通，分毫亦不能移者，如男女之性然；後天之性則反是，既曰間接之命，必有傳命之媒介在，其所謂環境時勢者是也。……具有共通歷史者，其後天性中必具有共通點也明矣。是謂之民族性。今云漢族之固有性，即指漢族固有後天之民族性也¹⁸¹。

蔡認為相對於人類共有的「人性」外，具共通「環境時勢者」會有共通的「民族性」。故他認為「漢族」具「愛和平」「尊祖先」「重質實」「善忍耐」四種「民族性」¹⁸²。同年，他又寫〈臺灣教育に關する根本主張〉，認為臺灣的「本島人」是「優秀漢民族的分支」（立派なる漢民族の分れ）「大民族之一分派」，因長久社會生活而構成一種獨特的「民族性」¹⁸³。蔡似乎暗示有屬於臺灣「漢民族」獨特的「民族性」，然並未進一步論其與彼岸中國大陸漢族「民族性」的差異。其實，此種曖昧的臺灣「民族性」論反映 1920 年代反同化政策所導出的臺灣人認同論述的特色，即強調與日本文化、「日本國民性」之差異，但不強調與中國文化、「漢民族」性格之差異。他們試圖從與日本的差異中，及基於上述基督教與儒學的人道主義與「漢民族」認同，想像臺灣文化的獨特性與「自治」（或成

¹⁷⁷ 關於蔡培火與植村正久的關係當再進一步考察，此留待後論。

¹⁷⁸ 蔡培火，《與日本本國民書》，《蔡培火全集 三》，頁 116。

¹⁷⁹ 蔡培火，〈灌園先生與我之間〉，《蔡培火全集 一》，首出於 1956 年。

¹⁸⁰ 蔡培火，〈我島與我等〉，《蔡培火全集 二》，頁 74。

¹⁸¹ 蔡培火，〈漢族之固有性〉，《蔡培火全集 二》，頁 90。

¹⁸² 同上，頁 90。

¹⁸³ 蔡培火，〈臺灣教育に關する根本主張〉，《蔡培火全集 七》，頁 27。

為某種獨立的政治共同體)的需要性。正是此種思想基礎上，蔡培火在1928年出版《與日本本國民書》。如其書名，在所謂的「本國民」中是不包含帝國內部的臺灣漢民族的。在該書中，他批評總督府的「國民性涵養」論。他認為這似乎是要將三百八十萬尚未具「日本的國民性」的「臺灣漢民族」與其他「母國人」切割，拒絕他們成為「日本國臣民」的想法¹⁸⁴。當然，就總督府的立場，就是希望「臺灣漢民族」能全部成為「日本國臣民」，才實施「同化政策」，鼓吹「國民性涵養」論的。然而，從蔡的立場觀之，「國民性」只是一種為維持「彼等的優越與特權」的虛構之物¹⁸⁵。蔡曰：「除人性之外，還有所謂國民性的事嗎？人性的裏面，豈不是已備有做國民的性了嗎」¹⁸⁶，不認為「人性」外，有所謂「國民性」。

更重要的是，蔡從「孔孟之教」(儒學)觀點展開議論。蔡引「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大學》)¹⁸⁷，「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論語·為政》)¹⁸⁸等文，然後釋曰：

如右列所謂孝、弟、慈的性，是指示乃為人應有的天性，謂有具備此天性者，即能夠以事君長，能夠接民衆而施政。即在一般日常如對父兄的孝弟的天性，是為人的根本性，此人性的根本的孝弟，立即移為可事君長而做國民的性。明白地教示孝弟的人性外，無別的當事君國的國民性¹⁸⁹。

蔡主要將「孝弟」理解為「人性」，將「當事君國」(「忠君愛國」)理解為「國民性」，然後從儒學中「家」與「國」、「孝」與「忠」(「事君」)、「孝」與政治(「為政」)的聯接，主張「人性」涵蓋「國民性」，不用教所謂的「國民性」。其實，如前所述，所謂的「國民性」不只有「忠君愛國」而已，但在蔡培火等殖民地知識人的理解，「國民性」涵養教育的重點似乎集中於「忠君愛國」性格的培養，是以他等殖民地知識人便主要從此角度理解之。而且，蔡的理解主要是據中國朱子學的解釋¹⁹⁰。亦即在中國朱子學中，「孝」與「忠」的行為對象是不同的，「孝」與「忠」的聯結，在於為政者的「修身」，在家為孝以成為道德楷模，如此家家實踐道德，國自然平治。這是一種以為政者的道德實踐為基準的儒學政治思想。蔡認為這是「漢民族」之「政治生活的鐵則」，亦是「世界人類政治生活的鐵則」，也是受過「孔孟之教」薰陶理當了解的「大真理」¹⁹¹。而且，他認為對已實踐此

¹⁸⁴ 蔡培火，《與日本本國民書》，《蔡培火全集 三》，頁161。

¹⁸⁵ 同上，頁161。

¹⁸⁶ 同上，頁162。

¹⁸⁷ 同上，頁162。

¹⁸⁸ 原著作為「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162)。

¹⁸⁹ 蔡培火，《與日本本國民書》，頁162、163。

¹⁹⁰ 如《大學章句》中，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曰「身脩，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又，朱子曰：「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此道理皆是我家裏做成了，天下人看著自能如此，不是我推之於國(朱子語類/卷第十六 大學三/傳九章釋家齊國治 356)。

¹⁹¹ 蔡培火，《與日本本國民書》，頁163。

一「政治生活的鐵則」的臺灣民衆要求「國民性的涵養」實是畫蛇添足。況且，在蔡看來，從皇太子行啓臺灣時之狀況來看，臺灣民衆亦忠順於日本皇室，且盡納稅與勞役的義務。為何還需涵養「國民性」¹⁹²？

蔡的懷疑有其道理，然而，上述蔡的儒學思想不同於「國民性」論背後根基於江戶儒學與家族國家觀的「忠孝一本」的思惟。歸根究底，這是歷史與社會、文化、習俗差異所導致的思想差異。但蔡似乎不去理解其中的差異，而從謀略的角度理解「國民性」並批評之。吾人或可說對殖民者意識形態的解構與暴露。然在筆者看來，蔡對「國民性」的批判凸顯出基於「同文」「同教」想像的「同化政策」偽善性與困難性。這點他的想法與後藤新平類似。只不過後藤從殖民者與文明的高度強調「民度」的差異，蔡所追求的則是，改善以「國民性涵養」為藉口的不平等現狀，及「四海兄弟主義」的理想¹⁹³。

總之，要求「忠君愛國」的「國民性」論述是承繼、改造江戶儒學的〈明治知識〉，蔡則強調吾人當回歸到「人性」的根本，而非是「國民性」的優劣來看待彼此。但蔡的思想同樣有根基於儒學的部分，只不過那是明清中國的傳統儒學思想與明治基督教思想融合後的一種人道主義、普遍主義的精神與理想。

代結論

首先，本文試圖透過對「國民性」概念的生成、展開與政策實踐等問題的檢討來說明〈明治知識〉的問題。「國民性」雖是個翻譯自〈近代西方知識〉中的譯詞，但「國民性」概念本身與「忠君愛國」等「國民性」相關論述是隨明治時期天皇制國家的誕生、近代日本文化國族主義的發展而開始流行的一種〈明治知識〉，受到承襲自〈江戶知識〉的儒學思考之制約。其後，「國民性」更成為臺灣等殖民地「同化政策」中的核心概念。因為日本殖民當局主導的「同化政策」主要是指就文化、精神層面意義的「同化」而言的，故以涵養「國民性」（「國民の性格」）為主要工作。

然而，是否習得日本人「忠君愛國」的「國民性」就意謂獲得「近代」（現代性）或「文明」的精神，或意謂成為日本人？對於殖民地時期臺灣人而言，答案當然不會只有一種，是因人而異的。不過，筆者以為透過上述的討論，吾人可瞭解到來自日本的知識某種程度操控了殖民地時期臺灣人對於「近代」與「文明」的想像與理解。雖然殖民地時期的臺灣人會以為透過日本可習得近代西方文明，但其實〈日本化的近代西方知識〉（明治知識）不等同於〈近代西方知識〉。故學習、涵養了「國民性」而同化為「日本人」，並不等同於「文明化」。更進一步說，吸收了〈明治知識〉亦不等同於瞭解以西方社會為基礎建的近代西方知識與文明（特別是精神文明）。〈明治知識〉中摻雜了許多來自日本歷史與社會、文化的雜質，其中亦包括了漢學知識、特別是朱子學。這些雜質在後來被丸山真男等戰後

¹⁹² 同上，頁 167。

¹⁹³ 對於後藤新平的同化論，蔡有所批判，曰：「後藤新平的八十年同化說，可以解釋為使我們永久作奴的秘策」（《與日本國民書》，頁 126）。

知識人認為是製造出日本扭曲的現代性之根本原因¹⁹⁴。

再者，許多統治臺灣的殖民地時期日本人與臺灣人間彼此以為具有類似的漢學知識傳統，但實際上有所差異。亦即以江戶漢學為背景的「明治漢學」不等同於以明清中國漢學為背景的「臺灣漢學」。是以「明治漢學」為基礎的《教育勅語》中之儒教道德不等於臺灣人觀念中的儒教道德。但是，以《教育勅語》為前提，以「國民性涵養」為內容的「同化政策」基本上就是建構在對〈近代西方知識〉與〈明治知識〉，及「明治漢學」與「臺灣漢學」間的類似與差異的想像和操作之上，並以之獲得政治利益。也就是說，對總督府而言，因為類似，所以將殖民地子民包攝於具近代文明與優良「國民性」的日本之「同化政策」是必須且可能的，從而立基於單一民族國家想像的《教育勅語》亦可適用於統治多民族的現狀。但因為現階段文明層次與「國民性」的差異，所以不平等的政治現狀是合理的。故在 1920 年代的台灣，以〈文化的同化〉〈物質文明的同化〉為基調的「同化政策」雖不排除〈法制的同化〉與〈政治權利的同化〉的可能性，但不積極執行之。

另一方面，對「同化政策」（「涵養國民性」論述）的接受與抵抗亦是刺激日治時代臺灣人身分認同發展的要因之一。其中，接受者有人混同了「文明化」與「日本化」，以「國民性」為文明的精神，進而接受成為日本人的身分認同。而抵抗者中，如蔡培火則以發揮儒學思想中普遍主義、人道主義的部分，以普遍的「人性」控訴「國民性」的虛構性、謀略性。蔡培火根基儒學的漢民族文化中心主義當支持著其對「漢民族」的文化認同，形成 1920 年代其身分認同的基礎。至於 1930 年代後，包括蔡在內的殖民地知識人如何建構其國族認同則是另一巨大問題，在此不再深論。

總而言之，在近代西方知識與漢學知識交錯的〈明治知識〉中，不管是統治者或是抵抗者，皆透過對「類似」與「差異」之誤解或操作而展開其政治思想。正因如此，正視〈明治知識〉的複雜性，並從此觀點來更進一步探究殖民地台灣的問題相信是有必要的！然篇幅所限，相關問題有待進一步考察。

¹⁹⁴ 參閱黑住真，《近世日本社会と儒教》（東京：ペリカン社，2003）頁 169、170。

參考文獻

1 中日文參考文獻

-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52。
- 山路愛山，《現代日本教會史論》，收入《日本の名著40》，東京：中央公論社，1971。
- 山内育男，〈「愛國」という語〉，《参考書誌研究》第31號，1983。
- 山室信一，《思想課題としてのアジア：基軸・連鎖・投企》，東京：岩波書店，2001。
- 大田英昭，《日本社會民主主義の形成：片山潜とその時代》，東京：日本評論社，2013。
- 小熊英二，《單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畫像の系譜》，東京：新曜社，1995。
- 小熊英二，《〈日本人〉の境界：沖繩・アイヌ・臺灣・朝鮮殖民地支配から復興運動まで》，東京：新曜社，1998。
- 上沼八郎，《伊澤修二》，東京：吉川弘文館，1988。
- 井上哲次郎，《日本陽明學派の哲學》，東京：富山房，1900。
- 井上哲次郎，《日本古學派の哲學》，東京：富山房，1902。
- 井上哲次郎，《日本朱子學派之哲學》，東京：富山房，1905。
- 井上哲次郎，《勅語衍義》，收入《井上哲次郎集 第1卷》，東京：クレス出版，2003。
- 井上哲次郎，《增訂勅語衍義 卷下》，東京：文盛堂，1899。
- 井上哲次郎，《國民道德概論》，收入《井上哲次郎集 第2卷》，東京：株式會社クレス出版，2003。
- 尹健次，《民族幻想の蹉跎：日本人の自己像》，東京：岩波書店，1994。
- 内藤燦聚編，《軍人讀本：忠君愛國》，東京：博文館，1892。
- 内田良平，《支那觀》，東京：黑竜會，1913。
- 中島力造，《戰後の變動と國民性教育》，東京：目黒書店 1916。
- 中越榮二，《臺灣の社會教育》，臺北：臺灣の社會教育刊行所，1936。
- 矢内原忠雄，〈軍事的と同化的・日仏殖民政策比較の一論〉，收入《矢内原忠雄全集 第四卷》，東京：岩波書店，1963。
- 田健治郎傳記編纂會，《田健治郎傳》，東京：田健治郎傳記編纂會，1932。
- 若林正丈，《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 增補版》，東京：研文出版社，2001。
- 石井寛治，〈問題提起（日本資本主義と植民地）〉，《社會經濟史學》51(6)，1986
- 石田雄，《明治政治思想史研究》，東京：未來社，1954。
- 石田雄，《記憶と忘却の政治學：同化政策・戦争責任・集合的記憶》，東京：明石書店，2000。
- 平石直昭〈主体・天理・天帝--横井小楠の政治思想-1-〉，《社会科学研究》25(5)，

1974。

有馬祐政，《日本國道論 = Our nationality》，東京：富山房，1907。

永井亨，《國民性及時代思想》，東京：岩波書店，1926。

吉田精一，《近代文藝評論史 明治篇》，東京：至文堂，1981。

伊澤修二，《伊澤修二選集》，長野：信濃教育會，1958。

伊澤修二，《樂石自傳 教界周遊前記》，東京：伊澤修二君還曆祝賀會，1912。

安西敏三，《福澤諭吉と自由主義：個人・自治・國體》，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07。

江島顯一，〈明治期における井上哲次郎の「國民道德論」の形成過程に関する一考察—『勅語衍義』を中心として〉，《慶應義塾大學大學院社會學研究科紀要》67，2009。

坂井衡平，《日本國民性論》，東京：大日本圖書，1922。

坂野徹，〈人種・民族・日本人：戰前日本の人類學と人種概念〉，《人種概念の普遍性を問う—西洋的パラダイムを超えて》，竹澤泰子編，京都：人文書院，2005。

長谷川如是閑，〈批判的見地より觀たる我國民性〉，《解放4月特大號 日本國民性の研究》，佐野學編，東京：大鐙閣，1921。

長志珠繪，《近代日本と國語ナショナリズム》，東京：吉川弘文館，1998。

松田宏一郎，《江戸の知識から明治の政治へ》，東京：ぺりかん社，2008。

松田宏一郎，《陸羯南》，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08。

苅部直，〈帝國の倫理：後藤における理想主義〉，《時代の先覺者 後藤新平》，東京：藤原書店，2004。

花森重行，〈國文學研究史についての一考察：1890年代の芳賀矢一をめぐって〉，《日本學報》21，2002。

芳賀矢一，《國民性十論》，東京：富山房，1907。

後藤新平，〈後藤長官の訓示〉，《臺灣教育會雜誌》27，1904。

後藤新平，《後藤新平論集》，東京：伊藤元治郎，1911。

後藤新平，〈最近植民政策〉，《同志社時報》115号，1914。

後藤新平，《日本植民論》，東京：公民同盟出版部，1915。

後藤新平，〈臺灣統治急務策の意見書〉，收於《後藤新平文書》。

春山明哲，《近代日本と臺灣：霧社事件・殖民地統治政策の研究》東京：藤原書店，2008。

品田悦一，〈排除と包攝——國學・國文學・芳賀矢一〉，《國語と國文學》，2012。

前田愛，《幻景の明治 前田愛著作集第四卷》，東京：筑摩書房，1989。

高山樗牛，《樗牛全集 第2卷》，東京：博文館，1912。

柴田廉，《臺灣同化策論》，臺北：成文出版社，1999。

宮崎滔天，《支那革命物語》，收入《宮崎滔天全集 第1卷》，東京：平凡社，1971。

- 黒住真，《近世日本社会と儒教》，東京：ぺりかん社，2003。
- 陳培豐，《「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本帝國的臺灣國語政策・近代化・認同》，臺北：麥田，2006。
- 陳翠蓮，〈臺灣政治史研究的新趨勢——從抵抗權力到解構權力〉，《漢學研究通訊》28：4，2009。
- 野田義夫，《日本國民性の研究》，東京：教育新潮研究會，1914。
- 隈本繁吉，〈本島人の同化に就いて〉，《臺灣教育》154，1952。
- 荻生徂徠，《弁名》，收入《荻生徂徠 日本思想大系 36》，東京：岩波書店，1973。
- 鹿野政直，〈臣民・市民・國民〉，《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 I》，東京：有斐閣，1970。
- 渡邊浩，《近世日本社会と宋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5。
- 渡邊浩，〈「教」と陰謀——「國體」の一起源〉，《韓國・日本・「西洋」——その交錯と思想變容》，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05。
- 鈴木貞美編，《雜誌『太陽』と國民文化の形成》，鈴木貞美編，京都：思文閣，2001。
- 鈴木貞美，《日本の文化ナショナリズム》，東京：平凡社新書，2005。
- 福澤諭吉，《文明論の概略》，收入《福澤諭吉全集 第四卷》，東京：岩波書店，1959。
- 駒込武，《殖民地帝國日本の文化統合》，東京：岩波書店，1996。
- 網島梁川，《梁川文集》，東京：日高有倫堂，1905。
- 蔡培火，《蔡培火全集》，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0。
- 蔡錦堂，〈日本治臺時期所謂「同化政策」的實像與虛像初探〉，《淡江史學》13，2002。
- 溝部英章，〈後藤新平論——鬭争の世界像と“理性の独裁”——〉，《法學論叢》101 卷第 2 號。
- 緒方武藏編，《臺灣大年表》，臺北：臺北印刷株式會社，1938。
-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 上》，收入《日本殖民地教育政策史料集成(臺灣篇) 28》，東京：龍溪書舍，2008。
- 臺灣教育會，〈臺灣公學校規則改正せらる〉，《臺灣教育》128，1912。
- 劉家均，〈國民性の涵養と臺灣教育〉，《教育論文集》，1922。
- 鶴見祐輔，《決定版 正傳後藤新平 第三卷》，東京：藤原書店，2005。

2 英文參考文獻

- Lydia H.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Roberto Romani, *National Character and Public Spirit in Britain and France, 1750-1914*. Cambridge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C.S. Baron de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Laws*. translated by Anne M. Cohler, Basia

Carolyn Miller, Harold Samuel Stone, Cambridge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附表 1：1945 年前書名有國民性的日文書籍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年
國民性十論	芳賀矢一	富山房	1907
國民性情論	ペアソン	大日本文明協會	1909
國民性と教育の方針	三澤糾	富山房	1910
歐米列強國民性の訓練	野田義夫	同文館	1913
國民性と大正の教育	北澤種一，吉村茂助	學海指針社	1913
國民性と宗教：通俗講話	加藤咄堂	中央書院	1914
國民性の上より觀たる鏡の話	石橋臥波	人文社	1914
貯金奨励論（貯蓄と國民性）	下村宏	東亜堂書房	1914
日本國民性の研究	野田義夫	教育新潮研究會	1914
神宮大麻と國民性	當山春三	神宮奉齋會本部	1916
戦争と國民性	芳賀矢一	富山房	1916
戦後の變動と國民性教育	中島力造	目黒書店	1916
米國國民性の新研究	鈴木半三郎	洛陽堂	1916
國民性傳説	原正男	實業之日本社	1917
忠勇物語：國民性之發露	劍持銳	國民書院	1917
我國民性としての海國魂	山崎米三郎	洛陽堂	1917
支那國民性と道教	木幡恭三		1917
支那國民性及國民思想	服部宇之吉	海軍大學	1918
文化より見たる鎌倉時代：日本國民性の研究	醍醐惠端	明誠館	1918
國民性と改造	トインビー	慶文堂書店	1920
國民性の發揮	福島安正	東亜堂	1920
歴史教授日案：國民性の陶冶を基礎としたる	富士徳治郎，増澤淑	明治圖書	1920
新思想と國民性の建設	常田力	積文館	1921
世界に於ける日本國民性の本領	佐藤鉄太郎	京都中學校	1921
古き外人の觀たる日本國民性	蜷川新 譯	拓殖新報社	1921
歴史上より觀たる日本國民性	大森金五郎	苓北文庫	1921
死生の境に發揮せられたる日本國民性	金子彦二郎	東京宝文館	1922
支那國民性論	渡邊秀方	大阪屋號書店	1922
世界評論明治大帝と我國民性	望月小太郎 譯	英文通信社	1922
日本國民性論	坂井衡平	大日本圖書	1922
米國々民性と日米關係の將來	鶴見祐輔	岩波書店	1922
運動競技と國民性	下田次郎	右文館	1923

國民性涵養叢書	國民性涵養叢書刊行會		1925
獨逸國民性ノ根本構造	R. Muller=Freienfels	南山堂書店	1925
國民性及び時代思想	永井亨	岩波書店	1926
支那の國民性	後藤朝太郎	巖翠堂書店	1926
日本國民性の解剖	大町桂月	日本書院	1926
我が國民性の新研究	小澤恒一	京文社	1926
支那國民性講話	後藤朝太郎	巖翠堂書店	1927
日本陶磁器と其國民性	福井菊三郎	共同印刷	1927
朋黨自利心と獨立自治心・支那國民性の解剖・日本國民性の精華	成瀬正雄	智仁勇社	1928
世界國民性讀本	大日本國民修養會	日本書院	1928
支那の國民性	大谷光瑞	大乘社東京支部	1928
國民性の考察	和辻哲郎（「風土 人間學的考察」の初稿）		1928
日本國民性の史的研究	坂井衡平	文書堂	1930
日本國民性の實証的研究	金子彦二郎	明治圖書	1930
皇道に基づく國體一致の國民性と共存共榮の生活に於ける經濟問題	岡部久四郎	好文堂書店	1932
日本總赤化徴候司法部不祥事件禍因根絶の逆縁昭和維新の正機：附・マルキシズムと國家及國民性唯一無窮生命神國日本	蓑田胸喜	原理日本社	1933
一木樞府議 長に對する世間の誤解：附・明治神宮を通じて觀たる日本の國民性	山田好文		1934
外人の觀たる日本國民性	矢吹慶輝等編	中央教化團體聯合會	1934
國語と國民性	三井透	明治書院	1934
我が國體及び國民性について	西晋一郎	日本文化協會	1934
國民性の本質について	百々己之助	尚文堂	1934
土耳其國民性	内藤智秀	日土協會	1934
我が國體と國民性	鈴木暢幸	大倉廣文堂	1934
我國民性と基督教の使命	田島進	新生堂	1934
フランス國民性の研究	アンドレ・シーグフリード	立命館出版部	1935
英國國民性	齋藤勇	研究社	1936
日本國民性	伊藤千真三	進教社	1937
俳句と日本國民性	杉田瓢村	關口書店	1937
國語と國民性	山田孝雄	文部省	1937
支那民謡とその國民性	七理重恵	明治書院	1938
國史より見たる國民性	栗田元次	教學局	1939

昆虫・言葉・国民性	市河三喜	研究社	1939
支那の国民性		日本産業貿易振興會	1939
日本人：附戦争と国民性・日本精神	芳賀矢一	富山房	1939
ロシア国民性の一考察	國際思想研究所		1939
ロシア民族の国民性	島田滋	阜月會	1939
漢族の性格を語る：文化と習俗に觀たる支那の国民性	永持徳一	泰山房書店	1940
外來文化の吸収と国民性	磯西忠吉	東京學友社	1940
國語と国民性：日本精神の闡明	菊澤季生	修文館	1940
支那国民性と其の由來	高山峰三郎	古今書院	1940
日本神話と国民性	肥後和男	皇道學會	1940
萬葉集と国民性	武田祐吉	内閣印刷局	1940
鎌倉室町文學と日本国民性	齋藤清衛	日本放送出版協會	1941
日獨国民性の相違とナチスの政策	浜田常二良	東亞研究所	1941
法律から見た支那国民性	滝川政次郎	大同印書館	1941
アメリカの国民性及び文學	齋藤勇	有斐閣	1942
日本ノ国民性	長谷川如是閑	國際觀光協會	1942
日本文化と国民性	大島正徳	春秋社	1942
アメリカの国民性及び文學	齋藤勇	有斐閣	1942
支那国民性と經濟精神	大谷孝太郎	巖松堂書店	1943
神社と国民性	曾根朝起	圖南閣	1943
アメリカ国民性の研究		太平洋協會出版部	1944
ドイツ国民性展開の理論	西本穎	有斐閣	1944
日本の臣道・アメリカの国民性	和辻哲郎	筑摩書房	1944
我が国民性の反省	大島正徳	宝文館	1945

附表 2：《臺灣日日新報》中標題有「國民性」的文章

標題	日期	作者
國民性と時代性	1910-05-06	象骨
國民性と教育方針	1910-07-28	三澤文學士
建築物と國民性（上下）	1911-02-27、28	島村抱月
殖民地と國民性	1911-06-08	
支那の國民性	1912-05-16	宇野哲人
國民性の發現	1912-08-17	內務當局者
國民性の發揮（御大喪に關して）	1912-08-21	
玩具と國民性	1914-06-27	
獨逸の國民性	1915-07-09	奥田書記官
家屋と國民性十二論	1915-11-21～12-04	下村民政長官
支那の國民性（上中下）	1916-03-09、10、11	樋口秀雄
支那の國民性（上）	1918-02-10	服部宇之吉
各國國民性比較觀（上下）	1918-05-21、22	箕作元八
論支那國民性（一～六）	1918-08-03、7、9、11、12、13	宇野哲人
支那國民性を論ず	1918-08-17、22、22、23、25	宇野哲人
涵養國民性之論說十五論	1918-08-29～10-03	周維金
支那の國民性九論	1918-09-28～10-11	後藤朝太郎
國民性の改造	1919-03-29	
思想と國體及國民性		岡田重久
國民性涵養論	1920-03-16	第一名臺南陳永諧
國民性涵養論	1920-03-26	第二名澎湖陳梅峰
國民性涵養論	1920-03-28	第三名臺北悟道人
國民性涵養論	1920-03-29	第四名埤雅張淑子
國民性涵養論	1920-03-30	第五名阿猴尤欽量
國民性の陶冶問題	1920-06-16	法學博士寺尾亨
國民性と飛行機の種類	1921-02-03	佐藤航空班長
古き外人の觀たる日本國民性	1921-11-02	法博■川新抄譯
■■は我國民性の弱點：特に殖民政策に關して	1922-05-14	
國民性涵養が第一：臺南州の教育施設	1922-06-12	臺南州知事 吉岡荒造
柔道宣傳の本旨は剛健なる國民性を 養成助長するにありと	1922-11-16	嘉納治五郎
我國の國民性	1923-05-13	
穩健著實なる國民性の陶冶 訓練に一層の努力へを拂へ	1923-06-17	田總督
穩健著實之國民性	1923-06-18	田總督

剛健なる國民性は亡び	1923-07-28	
論日本國體與國民性六論	1924-03-17、19、20、22、27、29	小野西洲
日米問題國民性雜感	1924-07-17	
國民性の大なる現はれ	1925-06-04	
日本人の學ぶべき獨逸の尊い國民性（上中下）	1925-06-11、12、13	エナ市 持地ゑい子
中華民國の國民性と背馳する共產主義	1925-10-02	
教育勅語は國民性と確固不拔の信念を表徴する	1925-10-30	木下内務局長
教育勅語與國民性	1925-10-31	木下内務局長
獨特なる吾國民性	1926-05-18	
支那國民性講話	1927-09-06	後藤朝太郎
日本の國民性と文化の研究にて	1927-10-01	
以政治的及國民性觀蔣馮戰爭	1929-05-27	
國民性の自覺と國家的信念	1929-10-25	紀平正美氏
皇徳の都市と武力の都市世界に誇る我國民性	1930-07-06	
デマを飛ばすは支那人の國民性	1932-12-30	香港通信員 大航生
菊と櫻と我が國民性	1933-11-18	大垣生
わが大和民族の“優美な國民性”	1934-02-03	
國民性教育に背馳する長中の存在を許さぬ	1934-03-06	
比島の國民性に少からず失望	1934-04-12	山本博士
刀劍と國民性（上下）	1934-12-12、13	本間順治
科學的に見た我が國民性	1936-05-04	西岡秀雄
英佛米の映畫と國民性	1937-03-31	K・K生
清純勇猛の國民性を表示す：輝やく日章旗	1937-12-05	
國民性に合致した立派な運動だ	1937-12-16	
精神病にも國民性がある	1938-02-06	
ここにも國民性の發露	1938-03-30	
支那民謡とその國民性	1938-12-10	
民謡と國民性（上中下）	1939-04-09、10、11	立野米太郎
支那劇と國民性：歌舞伎と支那劇の研究（二二）	1940-03-09	王昶雄
國民性の分析	1940-03-15	
白國は國民性から絶対に抵抗するだらう	1940-05-11	吉村外務省事務官
國民性と服飾	1941-03-06	
國民性の一面暴露（上下）	1942-04-24、25	
日伊の國民性は相似	1943-05-02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日期：2013年10月02日

計畫編號	NSC101-2410-H-009-023-		
計畫名稱	「漢學」與近代日本政治思想的展開和越境——「同文」想像與亞洲主義、國族主義的興起——		
出國人員姓名	藍弘岳	服務機構及職稱	國立交通大學
出國時間	2013年1月22日至2013年2月1日	出國地點	日本 東京

一、移地研究過程

第一天搭乘飛機到東京並住宿飯店，第二天(1月23日)則到東京大學本鄉的書店購買宮地正人《幕末維新史》等與國科會研究相關書籍，且到總合圖書館搜集資料與研究。此外，亦造訪二松學舍大學町泉壽郎教授。第三天(1月24日)到神保町書店購買鈴木範久《內村鑑三の人と思想》等與國科會研究相關書籍，並造訪ぺりかん社出版社，商談本人之日文書出版事宜。

第四天(1月25日)到第七天則是到東京大學駒場校區的圖書館、

東京大學本郷の総合圖書館與文學部圖書館搜集山中速人〈朝鮮「同化政策」と社会學的同化〉（《関西学院大学社会学部紀要》1982）、永井亨《国民性及び時代思想》《芳賀矢一選集》與國科會研究相關資料與研究。然後，在第七天（1月28日）整理這幾天所購書籍與影印之資料、論文郵寄回台灣。第八天（1月29日）、九天（1月30日）則是私人行程。第十天（1月31日）則又到東京大學本郷の総合圖書館與教育學部圖書館搜集佐野學編的《日本國民性の研究》（大鐙閣，1921）與國科會研究相關資料與研究。最後，第十一天（2月1日）搭乘飛機返台。

二、研究成果

1 舉行「第三屆台日亞洲未來論壇：近代日本政治思想的展開與東亞的民族主義」國際研討會，並在會中發表〈〈明治知識〉的展開與殖民地臺灣的政治——「國民性」論述與1920年代前「同化政策」、國族認同——〉一文。該研討會將出論文集，該文亦在修正後收錄在論文集中。

2 到日本參加2013年日韓政治思想学会共同學術會議，並發表〈〈明治の知識〉における「国民性」言説の展開と儒教——井上哲次郎から1920年代の台湾知識人・蔡培火まで——〉一文。

3 〈〈明治知識〉的展開與殖民地臺灣的政治——「國民性」論述與

1920 年代前的「同化政策」一文將收於《帝國在台灣》第二冊。

4 完成 “Facing the Sea, Becoming the West: The Imagination of

Maritime Nation and Discourses of Asia in Japan” 將收於

European-East Asian Borders in Translation (預定 2013 年出版)。

5 參與 Asia Future Conference 2013，發表〈「共和」概念と十九世

紀日本政治思想——東アジアにおける近代政治概念の翻訳と政

治言説の展開——〉。

三、建議

無。

四、其他

此次日本行的收穫是搜到永井亨《国民性及び時代思想》等在台灣難以看到的史料。這些資料對於深化筆者的研究，不可獲缺。但在日本的停留時間不長，且行前準備不充分，故無法更深入地探尋更多史料。希望下次前往時做好更完全的行前準備。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2013 年 10 月 2 日

計畫編號	NSC101-2410-H-009-023-		
計畫名稱	「漢學」與近代日本政治思想的展開和越境——「同文」想像與亞洲主義、國族主義的興起——		
出國人員姓名	藍弘岳	服務機構及職稱	國立交通大學社文所副教授
會議時間	2013 年 7 月 7 日至 2013 年 7 月 7 日	會議地點	日本東京
會議名稱	(中文) 2013 年日韓政治思想學會共同學術會議 (英文)		
發表題目	(中文) 〈〈明治知識〉中的「國民性」話語的展開與儒教——從井上哲次郎至 1920 年代台灣知識人蔡培火〉 (英文) The discourses of “National Character” and Confucianism in the Meiji Era : From Inoue Tetsujirō to the 1920s Taiwanese Intellectual		

一、參加會議經過

此次是參加「2013年日韓政治思想學會共同學術會議」是應會議主辦人松田宏一郎教授之邀參加的。該會由韓國與日本各自的政治思想學會聯合舉辦的，已舉辦過數次。此次主題是「做為政治思想的文化多元主義——在東亞的展望（政治思想としてのマルチカルチュラリズム—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展望）」。該國際研討會的論文發表人主要皆是韓國人與日本人，像筆者這樣以台灣學者身分出席發表論文的情況很少。

此次筆者在會中發表〈〈明治の知識〉における「国民性」言説の展開と儒教——井上哲次郎から1920年代の台湾知識人・蔡培火まで——〉一文。該文主要是探討「國民性」等在〈明治知識〉中表述特殊日本精神性質的類義概念群如何在明治日本產生與運用的問題。然後，以1920年代前的「同化政策」為主，考察日本帝國官僚如何理解、操作「國民性」概念群進行統治。又，同時探析日治時期臺灣知識人如何理解、接受或抵抗「國民性」概念。最後，從蔡培火批判「同化政策」〈文化同化〉的角度論及台灣的多元文化主義。

在與會過程中，筆者發表的論文由東京大學法學部苜部直教授評論。苜部教授可說是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領域的權威學者。

苜部教授除正面肯定筆者的論文外，亦提出一些疑問，主要是指出筆者的蔡培火論的國民性批判的問題。並在會後提供一些相關的論文與研究資料的情報。對筆者來說可謂收穫良多。此外，在會議過程中，筆者與韓國的政治思想研究者亦有所交流，討論包括台灣在內的政治思想研究狀況等，對筆者而言，相當新鮮，亦多所啓發。另外，會中有韓國學者報告韓國的多元文化主義狀況的問題，對筆者而言是未知的知識領域，深獲啓發。

二、與會心得

首先，此次與會讓筆者深覺此種跨國的學會交流的重要性與意義。雖然一開始會有許多摩擦，但藉由經驗的累積，兩國相關領域研究者亦增進了對彼此的瞭解。在國際政治關係逐漸惡化的當代東亞，這種民間交流的意義更顯重要。這亦刺激筆者今後參與推動相關跨國學術研究的事業的意欲。

再者，與會過程中，因為筆者不會韓國語，對方亦不太懂日本語和中文，故多是用英語溝通、交流。這更讓筆者意識到英語會話能力的重要性。這將是今後的努力目標之一。

三、発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明治の知識〉における「国民性」言説の展開と儒教 ——井上哲次郎から 1920 年代の台湾知識人・蔡培火まで——

交通大学社文所副教授 藍弘岳

The appeal to national character is
generally
a mere confession of ignorance
—Max Weber

はじめに

「国民性」の意味は必ずしも明確ではない。にもかかわらず、なぜこのような曖昧な概念が、二十世紀初期において、日本の成功と中国の失敗を説明するものとして多く使われていたのか。さらに、なぜそれは日本帝国の「同化」言説においてもよく見られるのか（後述）。一体「国民性」とは何か。これは単に〈近代西洋の知識〉から翻訳された概念であるとのみ言えるのだろうか。それとも、漢文脈の思惟と論理から理解すべきものであろうか。

本文は主として後者の視点から、井上哲次郎を中心にして、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国民性」論の展開と漢文脈における儒教思想との関連を考察する。さらに、同じ漢文圏に属する殖民地台湾で、伊沢修二、後藤新平などの帝国官僚は、どのように「同化政策」における「国民性」（或いはそれに類する概念）を理解し、運用していたのかを論ずる。これを踏まえて、主に蔡培火を例に、台湾の植民地時代の知識人はいかに「国民性」を理解し、批判していたのかを検討し、これを通して、〈明治の知識〉における「国民性」言説の展開と儒教との関連性を明らかにしたいと考える。さらには、植民地時期の台湾における〈近代西洋の知識〉と〈明治の知識〉、また〈明治漢学〉と〈台湾漢学〉との類似と差異、及びこれらの知識形態が交錯していた複雑な知識状況の一端を明らかにする。

一 〈明治の知識〉における「国民性」——概念の創出と言説の展開

1 洋文脈における「国民性」とその翻訳

明治時代においては、「国民性」と対応する洋文脈の概念は一つだけではない。まず、「国民性」という言葉を流行させたことに中心的役割を果たした芳賀矢一は、おそらくドイツ語の Geist を翻訳するためだといわれる。また、後述の井上哲次郎は、「国民の性格」（「民族の性格」）をドイツ語の

volkscharacter の訳語として使っている（井上哲次郎『国民道徳概論』）。さらに、坂井衡平は『日本国民性論』（1922）において、「国民性」に対応する概念として、nationality、national character、national spirit などの英語語彙を挙げた。それだけではなく、フランス語を通して、初めて「国民性」に関する概念に接した明治知識人もいたであろう。実際、19世紀のヨーロッパでは、代議制度の運用に伴い、「国民性」論は市民社会における市民の政治資質に関わるものとして盛んに論じられたようになり¹、それはしばしば、文明に相応しい国民の性格として説明された。こうした西欧の「国民性」に対する理解は、二十世紀初期の日本における「国民性」論の流行の背景ともなっている。

しかし、日本における「国民性」概念の形成過程を理解するためには、翻訳以外、すなわち漢文脈からさらに考察すべきであろう。漢文脈の視点から見れば、「国民性」は近代的意味の「国民」(nation) 概念が作られた後に、儒教に関わる「性」という概念と結び付けて作られた概念であったと言える。

2 「国民文学論」と「国民性」概念の創出

「国民」は一つの政治概念であるのに対して、「国民性」論の発生と流行は、「国民文学」と「国文学」という学科の誕生と関わっている。まず、国文学科の創立者の一人である芳賀矢一（1867-1927）は、1907年に『国民性十論』（初版1907）を発表し、これが最も早く「国民性」をテーマにした書籍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しかし、「国民性」概念の創出と流行は、やはり日清・日露戦争における日本の勝利と関連しており、日清戦争後に創刊された『太陽』や『帝国文学』で展開された、「国民文学」論の一つの結果とも言える。高山樗牛（1871-1902）はその代表者になっている。高山の考えでは、日本の「国民性」（「国民之性情」）には、A「快闊楽天」B「尚武任俠」C「道義情緒に富める」D「忠孝義勇を以て人道の大本となす」E「家系の継承を重むじ、国家の運命を懸念する」F「君父の為に死するを以て最高の名譽となす」（「小説革新の時機」）、G現世主義（「明治思想の変遷」）がある。

もう一人の「国民性」論者である芳賀矢一は『国民性十論』に、a「忠君愛国」b「祖先を崇び、家名を重んず」c「現世的、实际的」d「草木を愛し、自然を喜ぶ」e「楽天洒落」f「淡泊瀟洒」g「絨麗絨巧」h「清浄潔白」i「礼節作法」j「温和寛恕」と、十項目の日本人の「国民性」を挙げて論を組み立てた。高山樗牛の国民性論と比べれば、A-e、BCDE -a、E-ab、F-f、G-cとの間には対応関係が見られる。両者の「国民性」論にはある程度の影響関係があるかもしれないが、これらは共に、「国文学」に関わる日本神話、歴史書、文学テキスト、芸術作品といった材料を分析し、帰納的に得たものである。しかも、それは中国文化と近代西洋文化との比較によって抽出された、日本文化の特質

¹ Roberto Romani, *National Character and Public Spirit in Britain and France, 1750-1914*, p1-11.

であったと考えられる。その意味で、「国民性」は、発明された「国民」概念と、作られた「国文学」の伝統を踏まえて創出された概念と言えよう。重要なのは、ここで「忠君愛国」が「国民性」のひとつとされたことである（後述）。

しかし、「国民性」言説が爆発的に出現したのは大正時代、特に第一次世界大戦以後である。日本思想史の脈絡から言うと、これは「国民道徳論」の発展とも関連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われる。

3 「国民道徳論」と「国民性」言説の展開——井上哲次郎の議論を中心に

井上は『国民道徳概論』において、『教育勅語』が「国民道徳之粹」であると主張し、「国民道徳」が「国民性」（「民族的な精神」）によって顕現されたものだと述べている。さらに、彼は日本の「国民性」について、1「現実性」、2「楽天性」、3「単純性」、4「淡泊性」、5「潔白性」、6「感激性」、7「応化性」、8「統一性」（「同化性」）、9「短気性」、10「依頼性」、11「浅薄性」、12「鋭敏性」、13「狭小性」、14「虚栄性」といった、十四項目を挙げた。そのうち、前五項は明らかに芳賀矢一の『国民性十論』におけるcからhまでの項目に対応している。ただし、『国民性十論』が大方「国民性」がもつ肯定的側面の効果を強調するのに対して、井上は「単純性」、「淡泊性」、「潔白性」などの「国民性」の外に、「短気性」「狭小性」といった、負の面の「国民性」をも挙げた。さらに、「感激性」（感情的に激し易い）、「応化性」（環境に適応する能力）、「統一性」（同化能力）の三つの「国民性」によって、日本がなぜ近代西洋文明の衝撃に耐え、独立国家として維持できたのかを説明した。

そして、井上は、「忠君愛国」を「国民性」としては捉えていなかったが、その概念は彼の「国民性」論と「国民道徳」論における核心的概念とも言える。基本的には、「忠君愛国」は《勅語衍義》で恐らく初めて使用され、後に多くの修身書にも使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その概念は、《勅語衍義》に展開された「孝悌忠信」と「共同愛国主義」（「共同愛国の義心」）の二つの道徳概念が付け加えられ、作り上げられたものとも考えられよう。「孝悌忠信」は伝統的な儒教道徳であるのに対して、「共同愛国主義」は、古来からの東洋学術においてはほとんど論じられていないPatriotismの訳語であろう。すなわち、「忠君愛国」は尊皇を前提とし、伝統的な東洋道徳と近代西洋道徳が結合して作り出された、明治の新道徳（〈明治の知識〉）と言えよう。しかし、これは全く井上哲次郎自身の独創による理論とは言えず、江戸時代の家（イエ）社会の構造を踏まえ、忠孝（忠孝一致）と「尊王」などの江戸儒学の言説を継承しながら、改造したものであろう。

さらに、注目したいことは、普遍的な個人の性格を論ずる儒教理論が、特殊集団の性格を論ずる「国民性」論に援用されていることである。井上は、『国民道徳概論』に、荻生徂徠の気質不変説を用い、「国民性」（「民族的な性格」）の不変性を説明している。しかし、一方、「国民性」には「善」と「悪」がある

ので、「感情的に激し易い」（「感激性」）「気根が強くない」（短気性）といった悪い「国民性」は、教育によって矯正すべきだとも主張した。こうした考えには、おそらく「気質可変」を主張する朱子学の人性論、ないし教育論の影響が考えられる。

井上によれば、日本人自身もつ悪い「国民性」を変えるだけではなく、植民地にある異民族は「無勢力」的な「戦敗者」として、教育によって「日本民族」に同化されるべきである。ここでは、「日本民族」になるための最重要条件は血縁ではなく、「国民性」或いは「国民性」に基づく「国民道徳」になっている。これが、井上哲次郎の家族国家観が、単一民族の想像に基づきながらも、多民族帝国の理論としても援用し得る理由になっている。こうした考えの背後には、既述のように、朱子学がもつ楽観的な人性論が関わっているはずである。ただし、良い「国民性」を習得する修養の目的は、聖人になることではなく、理想的な日本人になるためであった。こうした「国民性」の言説は、日本帝国内部の日本人を対象にするだけではなく、植民地の人民に対しても、理想的な日本人になることを求めていった。

二 台湾における「同化政策」と「国民性」の言説

フランスと日本の殖民政策は、共にいわゆる「同化政策」或いは「内地延長主義」と言われている。実際、「文化の同化」（→日本人）が、日本の植民地統治政策の基調になっていた。

1、明治時代の台湾における「同化政策」

以下、それらを積極同化論と消極同化論とに分けて議論を進める。

I 積極同化論：伊沢修二（1851-1917）

積極同化論者としては、日本統治初期の台湾における国語教育の主導者である、伊沢修二（1851-1917）が挙げられる。彼にとって、「本国的精神」「国民タルノ性格」（「国民性」の関連概念）を養成することは、国語教育の重要な目的だったのである。そして、伊沢の考えでは、国語教育だけでなく、漢文教育も「同化政策」の重要な一環であった。というのも、台湾と日本はともに「孔孟之教」を教育内容にする伝統があるため、台湾人に四書五経及び尊皇道徳の内容も含まれた『幼学綱要』を訓読で教えることによって、台湾人を日本の漢学文化と「忠君愛国」の道徳に同化させることが期待できると考えていたのである（「台湾公学校設置に関する意見」）。しかしながら、「忠君愛国」とは、日本と異なる習俗、言語をもつ台湾知識人が熟知する「儒教」であると果たして言えるのであろうか。この点に対して、伊沢らが深く考えていた形跡はない。その一方、習俗と言語の差異を重く見ていた帝国官僚がいた。

II 消極同化論：後藤新平（1857-1929）

後藤新平は「内地延長主義」的な「同化政策」(〈文化の同化〉)に対しても、国体原理を台湾に適用することを否定はしないが、台湾人が同化する可能性については消極的に捉えていた。後藤の考えでは、二、三世代のうちに、台湾の「支那民族」がもつ「風俗習慣心性」(「国民性」に類する概念)を変えることはなおさらに困難である(「後藤長官の訓示」『台湾教育会雑誌』27、1904)。また、彼は「同化といい抑圧といい畢竟著述者の勝て」(同上)と、「同化」という言葉がもつ修辞の意味と偽善性を指摘している。その見方からは、一種の愚民意識と現実主義の思惟が見られる。実際、後藤は、「政治の要はよく人の弱点を乗ずる」(「台湾の統治」『後藤新平論集』)と述べている。また、別のところで、後藤は「宗教は人生の弱点に乗ずるもの」と説いているが、台湾統治のために使える「宗教」がないので、「衛生上の設備」でそれを置き換えたのである(『日本植民論』)。これは、政治が宗教を利用すべきだという江戸の武士、儒者の行動と言説にも、よく見られる考えである。これは、近代日本が「国体」の原理と言説を創出した要因の一つだとされ、荻生徂徠が「敬鬼神」を「術」、すなわち聖人の陰謀とした思想にも窺える²。同じく偽善を薦めないが、ある種の権謀的性格を持っているという意味で、後藤の殖民地統治論は徂徠学的だともいえるかもしれない。後藤の示したこのような消極同化論の態度は、学務課長持地六三郎に継承され、持地が台湾にいる間(1900 - 1910)に、台湾教育政策の基調になっていった。

2 大正時代の「同化」政策と「国民性」の言説

大正時代から、台湾殖民地當局の教育政策は「積極同化」に転換し、これは、辛亥革命や第一世界大戦などの外部要因によって促された民族自決ないし「国民性」競争の風潮に刺激されたものであろう。そして、こうした積極的な「同化政策」は、主として〈文化の同化〉を意味するものであり、その主要目的はまさに「忠君愛国」という「国民性」の涵養にあった。

三 1920年代における台湾知識人の「国民性」言説に対する受容と抵抗

1、1920年代における台湾知識人の「国民性」言説に対する受容

総督府が主導した「同化政策」における「国民性」の涵養に対して、それを積極的に受け入れようとした人々がいる。新竹の周維金はその一人である。周は朱子学の修養論における「聖人」の位置に「国民」を置き換え、「国民性」を聖人がもつ理想的な性格として捉えている³。したがって、周は「吾同胞」(台湾の「本島人」)は、「国民性を涵養」して日本人に「同化」すべきだと主張した。これは儒教の媒介によって、正面から「国民性」を理解した考えの一つで

² 渡辺浩「「教」と陰謀——「国体」の一起源」(『韓国・日本・「西洋」——その交錯と思想変容』東京：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2005)、373 - 411頁。

³ 「學愈全則人愈聖，人愈聖則位愈尊，於是政治上之階級不能不有分辨也。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就此而推之，學成然後國民有獨具之特質，自能立於世界」(『台湾日日新報』1918-09-28)。

ある。そのほかに、儒教思惟で以って、「国民性」を習得すべき理想的な性格として、近代の「権利」と「文明」の高みから「国民性涵養」の意味を強調した台湾人もいた⁴。

右のように、儒学思想の媒介によって、「国民性」は一部の台湾人に、聖人の心性あるいは文明的な心性といった、理想的な性格として捉えられている。したがって、一部の台湾人はそれを受け入れ、習得しようとしていたのである。

2、1920年代における台湾知識人の「国民性」言説に対する抵抗

『台湾青年』の創刊にも関与した蔡培火は、日本人の「国民性」言説に対して、最も積極的に有意義な批判を展開した。が、もともと、蔡培火の思想は直接に「同化政策」を否定するものではなかった。蔡の同化観には、明治キリスト教思想には、「四海兄弟主義」、人道主義という思想伝統の影響が見てとれる。蔡培火は、彼の師たる植村正久を通して、この思想伝統の系譜のなかに置かれていると言える。ただし、蔡は「四海兄弟主義」という思想が、儒学から来たことの意味をより重く見ていた。こうした普遍的な人類同胞愛の思想に基づき、蔡は政治体制における人道主義意味の「同化」の可能性を求めている。

しかし、一方、彼は日本の台湾に対する統治方針を「極端の本国中心の同化政策」とし、漢民族意識に基づき、「同化政策」と「国民性」（民族性）という概念の虚構性を批判するようになった。つまり、蔡の立場から見れば、「国民性」は単なる「彼らの優越、彼らの特権」を維持するための虚構物である⁵。最も重要なのは、蔡は儒教の観点から彼の議論を展開していることである。蔡は「孝弟」を「人性」と、「忠君愛国」を「国民性」と対にしてそれぞれ捉えている。そして、儒教における「家」と「国」、「孝」と「忠」（「事君」）、「孝」と政治（「為政」）を連結させて、「人性」にはすでに「国民性」が含まれているので、いわゆる「国民性」をさらに言う必要はないと主張している⁶。蔡は、主として中国朱子学の解釈に基づき、右のように主張したのだと思われる。つまり、これが、為政者の道德実践を基準にした儒教政治思想である。彼から見れば、すでにこうした「政治生活の鉄則」を実践している台湾民衆に対して、「国民性の涵養」を求めるのは蛇足なことになる。

⁴ その優勝作品には、「是故為民者當盡其為民之責、必具其国民之性而後可。……同是民也、而有国民殖民之分。何謂国民、曰天使我為民、而吾能盡其為民者也。何謂殖民、曰天使吾為民、卒不成其為民者也。故殖民無權利、而国民有權利。……殖民性尚粉飾、国民性重文明（『台湾日日新報』、1920-03-16）とある。

⁵ 同上、78頁。

⁶ 『論語』などの儒教テキストに対する解釈を踏まえて、彼は「右の如く、教、弟、慈なる性は、人間として是非あるべき天性だと指示し、此の天性を具備するものなれば、即ち以て君長に事ふることが出来、民衆に接して政を施すことが出来ると云ふ。即ち、日常一般に於ける、父兄に対する孝弟の如き天性は、人間としての根本性であって、此の人性の根本たる孝弟が、直に移して、君長に事へ得る国民としての性となるのである。孝弟たる人間性の外に、特別な君国に事ふべき国民性がないと明に教えられてある」（『日本本国民に與ふ』、80頁）と述べている。

蔡のこうした批判は、それなりの道理を持つであろう。しかし、右に述べた蔡の儒教思想は、「国民性」言説の背後にある江戸儒教と家族国家観に基づく「忠孝一本」の思惟とは、根本的に異なっている。これは結局のところ、歴史と社会、文化、習俗などの差異によって導かれた当然の差異とも言えよう。しかし、その思想が持つ意味は、「国民性」に対する批判を通して「同文」「同教」の想像に基づく「同化政策」の偽善性を暴露することにあるの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られる。とはいえ、蔡の思想を中国儒教にのみ還元して解釈するのも、妥当なことではないであろう。というのも、蔡が「人性」の平等性と普遍性を強調している部分は、やはり、明治キリスト教思想といった〈明治の知識〉に媒介され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からである。

人道主義思想ないし「四海兄弟主義」は、植民と被植民との差異、日本人と台湾人との差異を超えて、近代東アジアにおける知識人の連帯、ないし民族の差異を超えた階級連帯を支える重要な思想であったと言える。ここでは論じる余裕がないが、蔡培火が孫文の思想に共鳴する理由、及び彼と矢内原忠雄との友人関係は、やはりこの点から理解すべきであろう。

結論に代わり

〈日本化された近代西洋の知識〉（明治知識）は、〈近代西洋の知識〉に類似しながら異なっている。〈江戸漢学〉を踏まえて形成された〈明治漢学〉は〈明清中国漢学〉を踏まえて形成された〈台湾漢学〉に類似しながら、異なっている。〈明治漢学〉に基づいた《教育勅語》における儒教道徳は殖民地台湾人が考えている儒教道徳に類似しながら、異なっている。これらの類似と差異に対する誤解と操作によって、統治者と抵抗者は共に自分なりの政治思想を展開していく。この意味で、殖民地台湾の政治を探究するために、近代西洋の知識と漢学が交錯していた〈明治知識〉から出発すべきではないか。

最後、蔡培火が「同化政策」〈文化の同化〉を批判したことと多文化主義との関連を考えてみよう。蔡は「明治漢学」と「台湾漢学」、及び日本と台湾との習俗の差異を感知しながら、その差異をお互いに尊重することよりも、漢民族中心主義の発想へと居直ってしまった。その意味で、彼の思想はたとえ、ある種の日本帝国における多文化主義的な発想と言えながらも、結局のところ、台湾内部におけるマジョリティ集団の文化優位性を温存する抵抗の漢民族ナショナリズムと言える面を持っている。実際、台湾社会内部には、依然として漢民族中心主義、ないし閩南中心主義がかなり深いところに根をさしている。漢民族ないし儒教的価値観からの少数者への圧迫と蔑視は看過し得ない。多文化主義の原則をどのように細かな法の整備にまで徹底していくかは、これからの台湾の多文化主義国家としての重要課題と言えよう。

四、建議

無。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2013年日韓政治思想学会共同學術會議」論文集

六、其他

無。

國科會補助計畫衍生研發成果推廣資料表

日期:2013/09/23

國科會補助計畫	計畫名稱：「漢學」與近代日本政治思想的展開和越境——「同文」想像與亞洲主義、國族主義的興起——
	計畫主持人：藍弘岳
	計畫編號：101-2410-H-009-023- 學門領域：國別史
無研發成果推廣資料	

101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藍弘岳		計畫編號：101-2410-H-009-023-					
計畫名稱：「漢學」與近代日本政治思想的展開和越境——「同文」想像與亞洲主義、國族主義的興起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備註（質化說明：如數個計畫共同成果、成果列為該期刊之封面故事...等）	
		實際已達成數（被接受或已發表）	預期總達成數（含實際已達成數）	本計畫實際貢獻百分比			
國內	論文著作	期刊論文	0	0	100%	篇	舉行「第三屆台日亞洲未來論壇：近代日本政治思想的展開與東亞的民族主義」國際研討會，並在會中發表〈〈明治知識〉的展開與殖民地臺灣的政治—#8213；「國民性」論述與 1920 年代前「同化政策」、國族認同—#8213；〉。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1	1	70%		
		專書	1	1	70%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100%	件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本國籍）	碩士生	2	1	100%	人次	其中碩士生休學，故換人。
		博士生	1	1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專任助理		0	0	100%			
國外	論文著作	期刊論文	0	0	100%	篇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2	2	70%		參與 Asia Future Conference 2013，發表〈「共和」概念と十九世紀日本政治思想—#8213；東アジアにおける近代政治概念の翻訳と政治言説の展開—#8213；〉；及到日本參加 2013 年日韓政治思想学会共同學術會議，並發表〈〈明治の知識〉における「国民性」言説の展開と儒教—#8213；井上哲次郎から 1920 年代の台湾知識人・蔡培火まで—#8213；〉一文
	專書	1	1	100%	章/本	完成 ' Facing the Sea, Becoming the West: The Imagination of Maritime Nation and Discourses of Asia in Japan ' 收於 European-East Asian Borders in Translation (預定 2013 年出版)。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100%	件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 (外國籍)	碩士生	0	0	100%	人次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專任助理	0	0	100%		

<p>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p>	<p>舉行「第三屆台日亞洲未來論壇：近代日本政治思想的展開與東亞的民族主義」國際研討會。</p>
--	--

	成果項目	量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科 教 處 計 畫 加 填 項 目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量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路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計畫成果推廣之參與(閱聽)人數	0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 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 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 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選「已發表」意指已投稿並收於專書，但尚未出版。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在計畫期間，筆者完成、發表如下的論文。

1 〈「共和」概念と十九世紀日本政治思想—#8213；東アジアにおける近代政治概念の翻訳と政治言説の展開—#8213；〉。

2' Facing the Sea, Becoming the West: The Imagination of Maritime Nation and Discourses of Asia in Japan'

3〈〈明治知識〉の展開與殖民地臺灣的政治—國民性 〉論述與 1920 年代前的「同化政策」〉

第一篇日文論文從漢文脈與和文脈等不同文脈間翻譯的角度來論述的方法具獨創性，將使本研究成果在日文學界亦具學術應用之價值。

第二篇論文是少數在英文相關研究中從「海國」想像的觀點論述日本的亞洲主義，又同時探討 Alfred Thayer Mahan 的海權思想在近代日本與當代中國展開之論文。本文對於今後東亞海權問題的探討當具參考價值。

在第三篇論文筆者提出新的〈明治知識〉概念來探討殖民地台灣時期的知識情況問題。這可謂是一新的視角，具創新性。再者，本文亦論述、整理「國民性」概念在近代日本與台灣殖民地時期的使用情況（見附錄論文的附表），具參考與應用之價值。又，因筆者在文中亦只分析 1920 年代前的情況，故具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最後，本文揭露的〈近代西方知識〉〈明治知識〉〈江戶知識〉〈中國漢學知識〉的類似、差異與其交錯所構成的

1910 到 20 年代間〈殖民地臺灣知識〉狀況當對該領域之研究有一定的刺激與貢獻。